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研讨实录

第 147 期

147

解读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预估全年经济趋势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如何看待当前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  
中美关系何处去？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二年七月

##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是一个围绕发展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非赢利的公益组织，旨在推动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种公开或闭门的研讨会，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

基金会每月举办一次“上海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并与听众交流。沙龙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基金会不定期地举办小范围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座谈会，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据不同主题，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提倡讨论和争辩。

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判断我国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基金会每年与其他机构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基金会每年还与其他机构合办

“上海货币论坛”，对货币问题进行研讨。

基金会每年举办“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金融进行研讨，这也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我们把上述各类研讨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发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尽量将研讨活动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举办的研讨活动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陈震" (Chen Zhen).

##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最近四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4月23日基金会举办了“解读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预估全年经济趋势”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先生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国内外宏观形势与中国政策取向”的演讲，并回答了听众的问题。他指出，目前从全球经济来看，有三大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是新冠疫情的演进。第二个不确定性是美联储加息的节奏。第三个不确定性是俄乌冲突的演进。短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要尽快调整政策，尤其是应尽快放松财政货币政策，以及适当放松监管政策。中国现在特别需要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增长，很多问题都会接踵而来，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比如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

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生也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问题。他指出，

市场预期发生了改变，最近的房地产销售下降了20%，房地产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发商也好，居民也好，不会把因为短期刺激就拼命开发，拼命购买。如果降息的话，不用担心通胀，今年的猪肉没有问题，明年才是真麻烦。人民币适当贬值是好事，到了7就有压力了，6.8完全能接受。建议央行直接把数字人民币发到上海，发到低收入居民的数字钱包里。比如说上海中低收入的，先给一个人5千块钱。这就跟香港新加坡一样，无非就是我们用数字人民币，多了一个应用场景。

5月19日基金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了视频座谈会，会议围绕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产业链的断裂和重组；美国、西方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影响等议题进行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黄靖，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余南平，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刘洪钟，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分

别做了主旨发言并回答问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杨成主持了会议。

黄靖先生认为，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美国对俄的金融制裁增大了美国加息缩表的困难，增大了美元缩表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缩表带来的动荡中，中美合作是可以双赢的。余南平先生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营造一个扩大开放的空间和环境氛围，窗口期一旦失去对我国的未来影响会很大。刘洪钟先生指出，中国要争取未来 3-5 年的窗口期，要更深入、更大范围地开放以争取欧洲、日韩和东盟。徐明棋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重要的政策调整来改变外部世界以及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看法，维护整体的对外经济的环境，保证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顺畅。乔依德先生指出，最近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的冲击还是比较巨大的，但是俄罗斯还是有博弈的空间，还有反制的手段。金融制裁对全球金融货币体系，虽然有影响，但要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为时尚早。俄乌战争对全球政治格局，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明显和巨大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6月1日基金会举办了“如何看待当前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视频研讨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陈琦伟，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罗长远，上海美国商会总裁郑艺，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西门子中国执行副总裁吴永新等六位专家学者、企业家作了发言。研讨会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

徐奇渊先生认为，外力是压不垮中国的，总体上到，中国企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和困难，都是有能力应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避免自己把自己的增长空间压缩了。陈琦伟先生建议上海市政府成立外资招商的一个办公室，一站式解决外资困扰问题的办公室，务实地帮助外资企业，会很有助于提高效率。罗长远论述了当前有关外资利用的几个问题，全球化发展的几个趋势，以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判。郑艺指出要理性看待产业链的转移，短期内外资会持观望态度，关键要看今年下半年疫情管控情况。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外资包括美资企业，还是愿意在中国有长期发展

的。黄峰认为，这次上海的疫情对整个上海，包括长三角外商投资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特别对那些以全球市场为主的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给予重点关注。吴永新先生认为，外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会弱化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影响。二是会影响中国的税收下降，因为如果是具有扩张能力的，通常是效益比较好或者正在上升的产业。三是会给就业带来压力。主要的抓手有三项，第一是改革开放，第二是创新驱动，第三是构建合作生态体系。

6月25日基金会举办了“中美关系何处去？”视频研讨会，主要讨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创始人、知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先生的新书《美国和中国：谁会是未来全球经济领导者？》（*The United States vs. China: The Quest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新观点和新定义——有条件的、竞争性的、合作性的关系（*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先生

曾任白宫国安会任基辛格经济事务顾问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助理财长。他担任 PIIE 所长达 30 年，作为研究国际经济学的学者与中国关系匪浅。在研讨会上，他先作了主旨演讲。然后，四位中国专家分别作了点评，他们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随后伯格斯特对四位专家的点评进行了回应，并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研讨会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 目 录

解读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 预估全年经济趋势.....	1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43
如何看待当前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	100
中美关系何处去？ .....	172



## 解读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预估全年经济趋势

**张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邵宇** 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

系列座谈会第 68 期 2022 年 4 月 23 日

**乔依德**（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朋友，下午好。在当前疫情期间，在上海的朋友大部分只能在家里，大家可能关心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对当前经济怎么看。前几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我国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GDP 增长 4.8%，总体好象还可以。如何看待我们国家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在全球框架下，外围的经济走势会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两位基金会的老朋友，他们都在宏观经济领域做了很多贡献。第一位是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先生，另一位是经常参加我们活动的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生。他们讲完以后，我也会提几个问题，然后在座的各位也可以提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先请张明给我们做演讲。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好的，谢谢乔老师的邀请。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特别是上海的朋友，都不容易。根据乔老师的安排，我就讲 20 分钟。我想非常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对当前宏观的一些看法。我先讲 5 分钟全球的情况，因为这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目前从全球经济来看，有三大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是新冠疫情的演进。今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新的毒株可能产生，它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扰动仍在持续。第二个不确定性是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如果按照 3 月份议息会议释放的信号，美联储在今年年内加息 7 次，这是过去几十年来最陡峭的一次加息，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将会很大。第三个不确定性是俄乌

冲突的演进。这会决定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究竟是振荡盘整，还是进一步向上走。以上这三方面不确定性都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显著影响。

从全球新冠肺炎的演进来看，到4月中旬，全球确诊人数超过5亿，全球死亡人数超过了600万。今年上半年，病毒传播得尤其快，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目前确诊人数超过了8千万，几乎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确诊。最近美国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再度降到历史性低点，劳动参与率上升得非常快。通货膨胀率起来得很快，倒逼美联储不断收缩货币政策。

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冲到了2.8%左右，离3%已经不远。近期中美长期利率已经发生倒挂。美元指数也上得比较快，现在超过了100，日元兑美元汇率则跌到了多年以来低点。

俄乌冲突依然具有不确定性。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短期内结束，一是演化为中期对峙。无论哪一种情况对大宗商品市场都不是好消息。俄罗斯出口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乌克兰主要出口农产品。从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来看，尽管涨

得最快的是金属，但几乎所有分项指数目前都是阶段性甚至历史性高点。油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乌冲突之后油价最高上到 130，最近有一些回落，但是依然在 100 左右。

现在我担心的是全球经济重返滞胀格局。上世纪 70 年代有一次严重滞胀，上世纪 90 年代也有一次温和滞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疫情继续冲击经济，长期性停滞格局将会维持。俄乌冲突冲击大宗商品市场，通胀可能继续往上走。所以，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我们可能不会回到 1970 年代的滞胀，但是可能重返 1990 年代的滞胀。

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看上去还不错，而由于这波疫情是 3 月份开始的，所以二季度数据不容乐观。二季度 GDP 同比与环比增速可能均低于一季度。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

需求收缩是说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增速迄今为止都较疲软，出口增速过去两年非常强劲，但

---

是目前已经有走弱的迹象。

供给冲击表现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先是提高进口价格增速，进而推高 PPI 增速，但 CPI 增速因为猪肉价格处于低位而起不来。目前 CPI、PPI 增速的较宽裂口意味着工业中下游企业承压。我一会儿会讲，通胀在明年可能会有一个较大变化。

所谓预期转弱，是指多项单个看来非常合理的政策，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投放，导致宏观上的合成谬误，因为这些政策都具有较强的收缩性。现在市场主体预期不稳定，信心很低迷，无论耐用品消费还是投资，都非常谨慎。

从 2007 年以来，中国 GDP 增速持续走低。过去两年平均增速只有 5.2%，今年一季度增速 4.8%，二季度增速可能显著低于一季度。今年要实现 5.5% 的增速压力很大，除非有关政策大幅调整。

图 1 可以看到增长动力的变化，它是三驾马车每个季度对经济的贡献，蓝色是消费，黄色是投资，灰色是进出口。在 2021 年，投资萎缩最厉害，消费的贡献也在转弱。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是什么呢？消费的贡献还是较为疲弱，投资的贡献明显反

弹，但净出口的贡献开始减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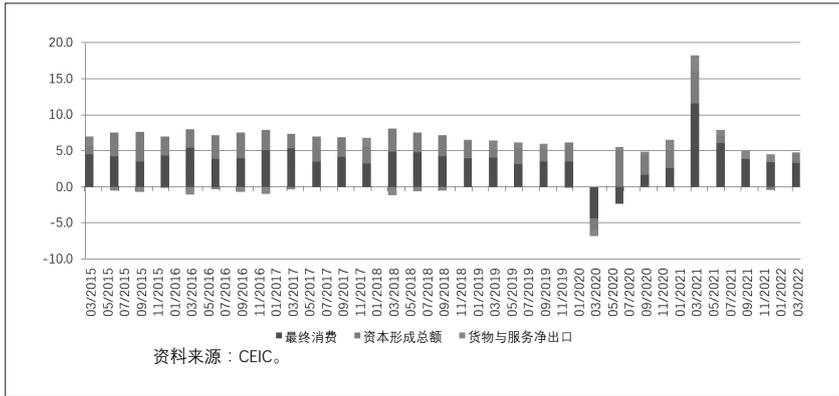


图 1：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在 2021 年 12 月仅为 1.7%，2022 年 1-2 月反弹至 6.7%，3 月份下降至 -3.5%，这一点值得我们忧虑。导致消费下降的原因有几个，第一是疫情本身会影响消费，想想目前的上海，还有之前的珠三角，都是如此。第二是疫情通过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会进一步冲击消费。第三是大家目前偏弱的预期，会显著抑制耐用品的消费决策。比如我本来想要换手机，现在在我的预期受影响，可能明年再换手机。诸如此类的很多决策都会被推迟。所以消费增速短期内还会下行，今年年内不太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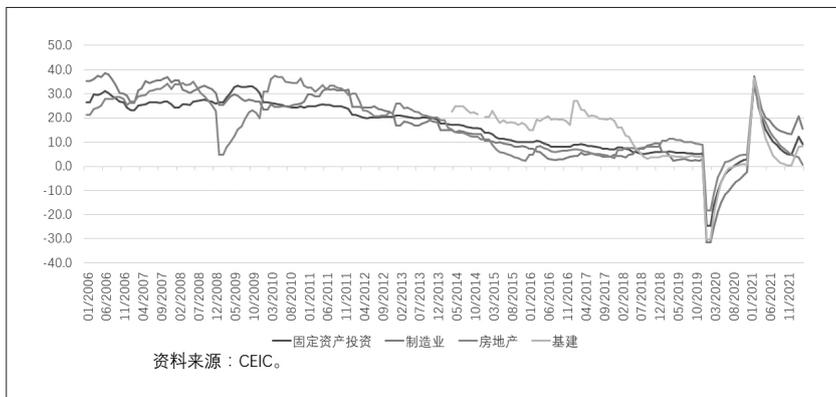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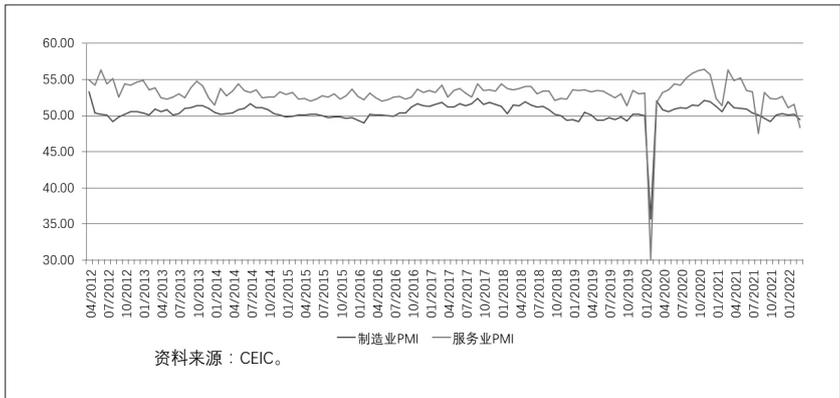


图 2：2021 年基建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太快

图 2 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其中橙色是制造业，灰色是房地产，黄色是基建。到去年年底，基建投资增速是最糟糕的，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了，中央还在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投资增速次之，因为过去两三年内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制造业投资表现相对还好。

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有一个明显反弹，这和中央财政政策前置，各地方政府搞开门红，搞基建，有着密切关系。但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还在往下走。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在下行，所以短期内投资不乐观。现在开发商和购房者都没有信心，即使银行放松相关贷款，上述两类主体也不贷款。基建投资

增速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地方政府目前缺少配套资金来跟进。



**图 3：2022 年 3 月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双双降至荣枯线下**

制造业投资增速短期内也不乐观。今年 3 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双双跌破了 50，上一次发生这个现象还是 2020 年的 2 月份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当前制造业和服务业先行指标双双疲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进行投资的动力是非常弱的。

过去两年，出口表现非常好。但是今年一季度和之前相比，进出口增速都在下台阶。导致出口

增速下台阶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全球疫情的复苏，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墨西哥等竞争对手开始复工复产。另外一方面，跟上海港被封，我们很多出口产品出不去有关系。今年一季度，进口价格上涨很快，在这种情况下，3月份进口增速跌到零，意味着我们的供应链已经受到显著负面影响。展望未来，今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肯定不会像过去两年那么强劲。

从三驾马车来看，消费短期内起不来，进出口短期内起不来，主要靠投资。房地产投资起不来。整个市场现在比较低迷，供应链受影响，工业生产严重受挫。在这样的情况下，制造业投资也很难起来。所以，基建投资的走势会决定我们短期经济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物价，目前CPI和核心CPI的增速都还是在1%到1.5%左右，处于比较低迷的空间。为什么CPI增速起不来呢？一个核心原因，是CPI篮子里的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增速依然处于低位。

随着全球食品价格的猛涨导致猪粮比显著下

降，猪肉的供给在下半年可能会明显收缩，但是需求还在。我比较担心的是，明年猪肉价格会有一个强劲反弹，带动食品价格，进而 CPI 增速反弹。今年 CPI 不用担心，但明年 CPI 走势就可能令我们比较忧虑了。



图 4：CPI 与核心 CPI 增速在 1%-1.5% 左右

明年中国经济同样可能面临滞胀的挑战。图 5 中蓝线是 CPI，橙线是 PPI，灰线是进口价格指数。去年年底的时候，CPI 和 PPI 的裂口是最大的，大概 12 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略有收窄，原因是进口成本在下降。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可能再次提升进口价格，使得 PPI 增速的回落不会那么快。CPI 和 PPI 增速短期内仍会保持较宽裂口，这意味着中

## 下游工业企业会继续承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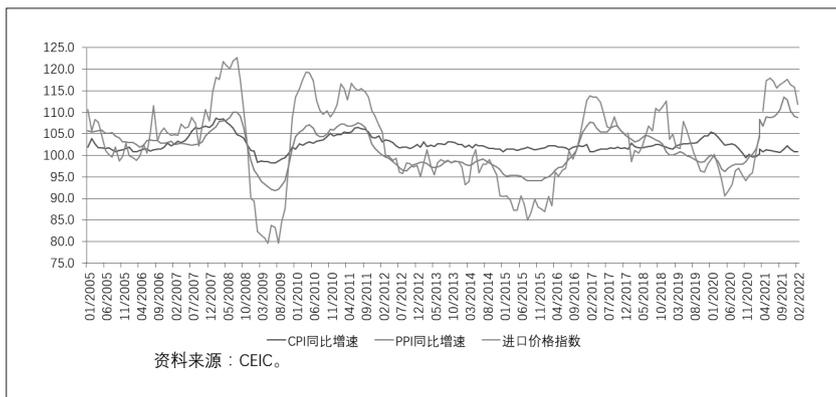


图 5：近期 PPI 增速有所回落，  
但俄乌冲突可能再度让 PPI 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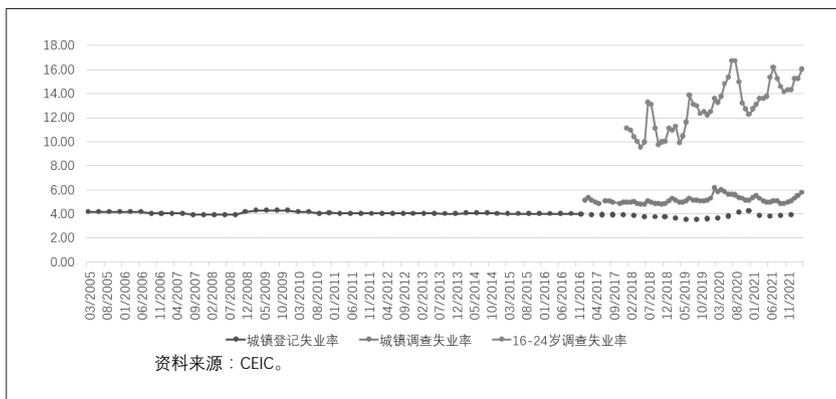


图 6：当前调查失业率与青年人失业率  
均处于较高水平

2022 年 3 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调

查失业率明显上升。考虑到二季度末是毕业季，今年大学毕业人数超过 1000 万，达到历史峰值。所以今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压力还是挺大的。

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不容乐观。股市指数的持续下行意味着投资者没有信心。最近我写了好几篇文章，都在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放松宏观政策和调整监管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建议上调中央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二是建议发行大规模特别国债用来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支持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大投资，第二是给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三是暂时性放松对政府平台公司的监管，尤其是暂时降低对隐性负债的监管力度。如此才能真正提高基建投资增速。

在货币政策方面，4 月 15 号有一次降准，但降准幅度不及预期。和降准相比，降息可能更加重要，只有降息才能实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与此同时，应该让人民币贷款和社融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现在的问题是，光靠放松货币政策还不行，目前还缺乏对信贷的需求，那么怎么激发对信贷的需求呢？一方面是前面讲的财政发力，另一方面监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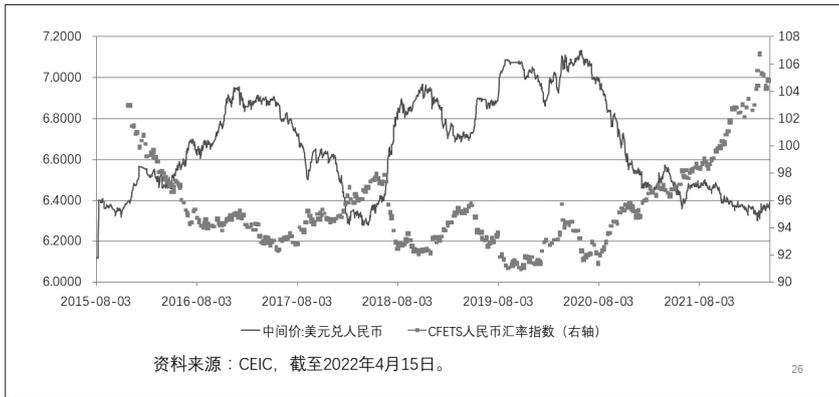
---

政策也应该调整。我们建议现在暂时放松对房地产开发商的监管措施，包括资产负债表三道红线与银行贷款集中度管理。但是话说回来，现在开发商也很聪明，你暂时性放松，也未必能够有效刺激新增投资。更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既要避免出台新的具有紧缩性的政策，还要调整之前出台的紧缩性政策。一旦微观主体预期偏弱，消费者就会推迟耐用品消费，企业就会推迟固定资产投资，这就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甚至产生恶性循环。所以宏观政策即使大幅放松非常重要。

很多人担心中美利率倒挂会压缩中国央行降息空间。中国 10 年期国债利率目前降低到了 2.7-2.8%，美国上到 2.8% 左右。但是利率倒挂又能怎样呢？很多人担心这会引发短期资本外流并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图 7 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蓝线向下代表人民币升值，橙色的点是人民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向上代表人民币升值。去年年底，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达到历史高点。这说明在宏观经济增速下行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实在太强了。所以在当下适

当容忍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是利大于弊的。去年我们对欧元升了 10%，对日元升了 12%，如此强劲的升值使得我们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适当的汇率贬值对中国出口是有好处的。



**图 7：2021 年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  
分别升值 2.3%、10.0% 与 12.4%，  
人民币兑 CFETS 货币篮子升值 8.0%**

我认为，抢在明年 CPI 增速可能显著反弹之前，即使下调基准利率，降低国内主体融资成本，对稳增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汇率真的贬值太快，我们还可以适当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出的管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短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要尽快调整政策，尤其是应尽快放松财政

货币政策，以及适当放松监管政策。中国现在特别需要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增长，很多问题都会接踵而来，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比如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

我讲完了，谢谢。

**乔依德**：特别感谢张明。张明现在还在四川绵阳挂职，担任绵阳市的常委和副市长，他工作很忙，但是我看他文章还是发的不少。今天周末，他抽空跟我们分享了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谢。等会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张明。下面我们想请今天第二位发言嘉宾邵宇先生，请他跟我们分享对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邵宇博士，你发言吧。

**邵宇**（东方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谢谢乔老师。刚才张明的其实满充分了，而且大部分我都非常同意，包括今年经济所面临的压力。今年国内就是一个衰退的趋势，明年的话，和全球一样进入到滞胀的格局。衰退的时候还能发点力，到了滞胀，就有力也发不出来了。

刚才张明都提到了，现在讨论的就是这三件

事，加息，疫情，再加上地缘冲突，地缘冲突主要提高通胀。除了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的整个产能供应是有限的，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的产能冗余在这里。美国已经调了增长和通胀的预期，增长从4调到2，通胀反过来从2调到4。通胀调到4的话，不光是短期影响了，中期来看的话，以前的泰勒规则可能就不行了。它不光是一个数值的变化，它意味着美联储的规则和整个全球的通胀水平都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当然我也同意不会是两位数或20%的通胀，肯定不会，但是可能4-5是常态，如果跟原来30年平均2%相比，这个上升就是很大的幅度，而且是中期的。

3月份的数据已经看到了，4月份最近的数据显示，周边区域的人流、物流的部分指标已经下到了比2020年3月份疫情冲击第一波时更低的值，创新低了。也就是说，过了春节以后，又来了一个同样的缺口，这个缺口比春节因素大，比历年的因素还要低。相比2020年武汉疫情的冲击，这次毕竟不一样，这次对上海的产业链，对中国、对全球的冲击量级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有一个说法，认

---

为这一轮的冲击要比武汉那一轮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扰动，可能还要更大。这个冲击目前是短期的，但是很可能变成中期的。中期就意味着，整个供应链，包括全球供应链，可能都会面临一个中断的过程。现在不是狠抓物流吗？现在需要办全国通行证，这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耕种需要春耕证，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在目前这样一个防疫政策的趋势下来看，可能还会持续，乐观的看大概也要一个月时间，也就是5月中旬的时候，可能按照动态清零的方式能够慢慢收敛，比如说到0的位置。问题是，这个不光是上海，周边的产业链也都停顿下来，这个冲击已经发生了，影响比较大。

那么刚才张明提到的几点我同意，比如说发钱，给企业，也包括居民发钱。甚至我们给央行直接建议，直接把数字人民币发到上海，发到低收入居民的数字钱包里。当然这个不是货币政策，是财政政策。降准降了半次，理由是以前降了一次，另外有6000亿的利润划转，等于又是半次。但是现在市场的信心，多大程度才能够打开呢？这真的需要一个火箭筒，即便张明刚才提到的那几点放在一

块，我觉得也达不到这个量级。

很简单的道理，房地产销售 20% 的下降以及房地产预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发商也好，居民也好，不会把因为短期刺激就拼命买买买，开发开发开发，卖地卖地卖地。不会的，因为今年熬过去以后，明年还是没有变。不是说货币不够，问题在于信用扩张，房地产和上下游的基建，包括家居装修，整个产业怎么扩张呢？做了这么多年，大家发现中长期的居民贷款在 2 月份居然是负增长。我调研过很多居民，现在降了 50% 个 BP，首套 20% 了，你还买不买？他说不买。上海还在涨，不是挺好吗？他说涨是涨，最后还有房产税等在那里。这个预期就变化了。当年为了把预期拉过来，我们是 4 万亿的基建，接近 30 万亿的房地产，加上地方投资，就起来了。当时的那个量级对应整个经济的体量，大概占 70% 左右。现在整个经济的体量是 100 万多亿了，你加在一块，能有多少投资呢？一半肯定到不了，因为总量在上升。

政治局马上就要开会了，可能要修正今年的增长目标，要改 KPI。按照我们的逻辑，如果这次冲击

---

真的比武汉那次大，大家也知道当年是没有设 KPI 的，对吧？没有设 KPI，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没有那么急促了。现在为什么财政和货币没有大幅度的动作，还是延续了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动作，那时候没有严重的疫情，努努力，5.5% 还可以冲一下。现在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美联储加息反而不是事了，因为昨天跌得很厉害，大家觉得这个反正比较确定了。这样来判断，我觉得可能 KPI 不要那么高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优化，或者给个底线，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大家还是可以做到的。否则目标太高，哪怕火力全开，哪怕不受限制的降准、降息，怎么跳也够不到。货币政策的特点就是它能拉不能推。我觉得 KPI 一旦调整以后，政策自然就会有相应的调整。

什么东西能够改变预期或者升信心呢，这个大家也明白。问题在于现在比较胶着，而且也比较敏感，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张明的政策建议我都同意。降息的话，我倒不是担心通胀，今年的猪肉没有问题，明年才是真麻烦。现在有个头疼的事，现在的理财利率是 3 以下，今年的

通胀目标是 3，大概率能实现，而且能超过去，那就是负利率了。对于本来就比较纠结的低收入人群，实际利率为负的压力就会更大了。大家开玩笑说，上海因为这个疫情，上海对其他地方的汇率是 1 比 2.5。通胀还是挺明显的，要是再负利率，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肯定不干。

关于美元利差，张明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其实贬值是好事，到了 7 就有压力了，6.8 完全能接受。前一段升了那么多，不太健康的因素在哪里呢？人民币不是避险货币，现在风险投资减少，人民币不是一个避风港，没有那么好。特别是这次冲击以后，我觉得顺应这个潮流，相对一篮子货币降下来，再贬一点，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话，出口还能再往上拉一拉，3 月份的出口指标已经开始下去了，供应链再出问题，加分的都已经往下减了。

我小结一下，我非常同意刚才张明所说的。对于政策的优化，我觉得都可以做。量级多大，取决于我们 KPI 怎么样设定。我觉得 KPI 应该会有调整，整体的政策应该也要调整。其实进化的关键，不管是组织，还是细胞、病毒，适者生存，针对新

---

的变化的情况来做适应，才能够让这个游戏持续玩下去。我就讲这些。谢谢。

**乔依德：**谢谢邵宇。谢谢张明和邵宇两位给我们做了比较精采的发言。我听了以后也颇受启发。我觉得他们也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地把自己对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些看法提出来。我想先提一两个问题，等会把时间留出来给参会的各位嘉宾。你们两位都提到，你们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是稍微贬一点，也不一定是坏事。大概两年前，汇率跌到过7，后来又涨回来，昨天是6.5。你好像没有提到，过去一年中流到我们国内的资金比较多，但大概从2月或3月开始，资金外流比较多。主要是流动性比较大的资金，特别是投资于我们股市、债市的资金比较多。这方面你们会不会有一点担心？这些资金流出以后，对我们的资本市场会不会带来冲击？我们的直接投资，因为疫情的关系，会不会也流出去？你们两位怎么看的？哪一位先讲？

**张明：**我先说一下。第一个问题，怎么看去年和当前的跨境资本流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什么呢？比较关注的是北上资金的流动。媒体报道，前

一段时间北上资金持续留出。我觉得看待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还是要从国际收支表的角度来梳理，事实上去年总体来看，北上资金是在流入的。因为当时全球比较乱，中国相对稳定，当时我们的利率又显著高于全球利率，所以去年外国投资者对于中国债券的投资明显增加，对于股票投资也有一些增加。但是去年我们金融帐户还有较大的误差和遗漏项的净流出。实际上这几年，中国遗漏项的净流出，多的时候一年两千亿美元。所以，总体的资本情况，特别是在金融帐户里其他投资项的流出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今年的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的确出现了北上资金的外流，里面可以分为股和债，股的资金波动比较频繁，如果跌的比较多，资金又会回来。但是我对债的资金是比较担心的，因为随着美国利率的上升，其他国家在加息，所以中国债券相对于美国债券的吸引力在下降。这一块的钱，可能短期内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比较大的流入了。此外我更担心的是，通过金融帐户的其他投资项其实是跨境信贷，还有误差和遗漏项的大规模资本外流。今年，因为我们在疫情防范上出现了一些

波折，同时，的确有很多企业家，还有一些高净值人群，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会加速把资产组合投到海外，这点是我比较担心的。

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资金的外流会不会对股市产生影响？我之前对股市写了两篇文章，应该这么来讲，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中国股市的下跌的确与北上资金的外流，与美股港股里中概股的下跌，关联很密切。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政府一定要介入，要稳定股市。后来股市的确暂时止跌了。但是坦白讲，最近这轮股市的下跌，外因已经不重要了，主要还是因为疫情冲击下，那么投资主体对于短期经济、政策面、市场的前景不乐观。这段时间国内资金在减仓，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都在减仓，导致了市场下行。所以要止住这轮股市的下跌，不是靠资本回流，而是靠中央政府尽快调整政策组合。包括邵宇前面讲的，要么你调低目标，要么你尽快出台新一轮刺激政策，同时尽量避免再出台紧缩性的行业政策。只有大家预期稳了，这拨股市才有可能见底，我先讲这么多。

**乔依德：**谢谢张明。邵宇，你对这个问题有什

么想法？

**邵宇：**我都同意的。我们都在观察市场，看到的東西差不多，所以我們的判斷比較一致。短期的話，資金流出或者疫情影響，都已經體現了。最近連續幾個月，北上的股權都是流出，證券配置少了小幾百億，這個很正常。我比較擔心中長期，大家最近看到上海商會、領事館給上海市政府關於資產這方面的訴求，這是比較頭疼的。FDI 是最穩定的中長期的投資，短期來來回回都很正常。中長期的話，政策的預期是最重要的。

**乔依德：**谢谢你们两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下面我再提一个问题，刚才你们两位多少都提到财政刺激。前一阶段的财政刺激，比较多的是直接给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这也是对的。你们两位提到能不能给居民消费者本提供一些财政的支持，美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也做过这些。这对于提升消费的信心可能也有好处。邵宇刚才提到可以通过发数字货币给大家，可以给低收入的，或者这次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这个你们可以不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邵宇提到这次受冲击的幅度大于武汉

---

的情况，也提到要提高能量级。你们看看，这个量级到什么程度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信心，包括投资的信心，居民消费的信心。要么邵宇你先讲？

**邵宇：**我刚才提的那个非常直接，就是直接给数字人民币就行了。比如说上海中低收入的，先给一个人5千块钱。这就跟香港新加坡一样，无非就是我们用数字人民币，多了一个应用场景，电商应该可以对接，这比你拿到奇奇怪怪的商品要好很多。

量级的话，当年GDP是50万亿，投资的大数是30万亿，占到五分之三的比重。我们现在整个加在一块要投60万亿，是不大可能的。现在房地产这一块下来20%，投资就算正负零，基建能补得上吗？我自己算了一下，新基建3到5万亿，旧改就算2万亿，绿色今年能放2万亿已经了不起了，算起来也就这么多钱。其他的那些，经济总量来比的话，我觉得不可能达到原来那个量级。你现在也不是要V型反转，目标要设定为3、4、5的话，这些量够不够，这个就要看了，大致可以算一下。我觉得挺难做到这么大的量级，因为现在有了这样一

个体量上的扩张，我还想不到那种一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

**乔依德：**张明，你有什么想法？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张明：**好的。其实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就多次采取了给美国家庭直接发支票的做法，这对疫情之后美国消费的复苏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轮的疫情，补贴主要给了企业，逻辑是只要企业活下来，企业不裁员，员工的收益就有保障，这也不错的。但是这次疫情的冲击更加复杂，首先它比武汉的冲击更持久，而且是多点冲击，珠三角、长三角，包括东北。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感觉，不妨尝试直接给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中低收入家庭。我觉得发现金比发消费券要好，消费券可能鼓励人们当期把这个钱用了，发现金其实对于稳定预期很有帮助。当然可以采取数字货币和现金补贴都发，因为有些中低收入群体对手机操作还不很顺畅。同时，我觉得发现金补贴还要考虑到公平问题，现在上海有疫情，但是全国很多地方的疫情冲击也比较大。我觉得可以由中央财政给全国中低收入

---

入人群发一笔钱，同时上海财政再给上海市民发一笔钱，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规模是多少呢？2020年疫情的时候，国债发了1万亿，我觉得这次疫情比上次要严重，这次如果用特别国债激活消费，规模不能比上次低。假定我们今年用1.5万亿来发现金补贴的话，正好占GDP一个百分点，我觉得至少要这个规模，才可以在总量有意义。我就讲这么多。

**乔依德：**谢谢两位，两位的很多想法我觉得很有启示，我也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听取，能够进一步地研究。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今天有不少人参会，大家也可以就直接提问。我先念一下吧，苏立峰有一个问题，说请教两位老师，既然经济增长这么难，可否通过存量改革来改善经济状况？包括缩减收入分配差距，这是有利于长远的政策，存量改革这几年推进的难度这么大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那么请两位对这个问题谈谈你们的看法吧，张明你开始。

**张明：**我先回答一下。首先，我们现在面临是短期经济急速下行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以短期管

理政策来应对。中长期的结构性政策，往往解决不了短期的问题。第二，短期的收缩性政策，像我前面讲的，应该慎用。比如说像房产税，像税率的调整，从长期来讲它是对的，但是在短期内我们需要更多人去消费，更多企业去投资，在这个时候再出台这种强有力的收入分配再平衡政策，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是有负作用的。第三，通过给中低收入老百姓发钱，这也是一种纠正收入分配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短期和长期的结合。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想办法去动富人的奶酪，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要想办法的是，怎么把经济做起来，同时怎么帮助收入偏低的阶层，让他们过得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要集中考虑的短期政策。

**乔依德：**谢谢张明，他的回答也很好，怎么把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现在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邵宇，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邵宇：**没什么要说的。

**乔依德：**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两位老师。美国国债利率倒挂，对中国的经济周期、资本流向，以及股市的影响是什么？谁先开始回答？

---

**邵宇：**我讲两句。一般来说，长期倒挂的话，意味着衰退，因为短期利率上升太快。新兴市场和美国之间的利差消失，一般会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回撤到美国，对新兴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有比较大的资本外逃风险。1998年以及最近的金融市场冲击，都是这个因素引发的。我们中国相对来说，抗击打的能力更强一些，但是也面临政策的优化。特别是现在对疫情的妥善应对，我觉得可能会对资本流动，不管是短期或者中期，都有一个关键的作用，这方面看能不能作出更多政策的优化吧。

**张明：**应该说当前中美的经济周期是错位的。美国现在的周期还在向上，中国的周期在向下，中美周期的错位导致目前货币政策的反向。所以，中美的利差倒挂在所难免。这时候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从国内的需求来出发，应该容忍汇率的适度贬值，应该容忍短期资本的适度外流。当然，如果外流过快，贬值过快，我们可以收紧管理。在这个情况下，对股市肯定有一些负面作用，但是最近股市表现低迷，主要还是国内的因素使然。美国的利率倒挂，这次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次如此急促的加

息节奏，可能会使美国的债券市场出现一些异动。所以说利率倒挂未必就意味着美国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经济衰退。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还是依然短期美国经济走强，通胀上升，长期利率上升，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

**乔依德：**现在大家比较踊跃，有一个问题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个人的资产怎么保值升值？邵宇，你是证券行业的，张明也做过证券行业，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邵宇：**多买点保值资产，少持有风险资产吧，以避险为主吧，大概就这样。

**张明：**目前的确要适当争取一些避险资产，包括黄金，包括美元。同时，我觉得在市场看不清楚的时候，要多保留流动性，很多东西可能还在调整，跌才能跌出机会来，这时候不要盲目抄底。像我前面讲的，短期中国股市什么时候见底，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做政策调整，否则短期波动的态势可能还会延续。

**乔依德：**下面一个问题是，两位老师说不妨允许人民币适当贬值，那么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不

---

是应该适当持有更多的美元？如果企业采用这样的策略，对短期经济是不是也会产生冲击？

**张明：**会有这个问题。在贬值预期下，企业当然会选择推迟结汇，这个很正常嘛。在外汇市场上，你不是升值预期，就是贬值预期。延迟结汇，无非就是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少了一些，可能推动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但是我们前面讲过，适当的贬值对中国宏观经济是好事情，所以没有必要害怕，我们可以容忍适当的贬值。

**乔依德：**我讲一个观点，对企业来说，还是要注意汇率中性，还是不要把企业的盈利放在短期汇率的预测上，这是有风险的。你做套期保值是应该的，但是你不要去预测短期的汇率波动，这个难度是很高的。我记得前一阶段，我们提出汇率中性，这一点对企业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以前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

下面一个问题是，请问两位老师，如果未来供应链外移，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邵宇：**我没有测算过。现在还没有看到大的企业外迁。有一些 case，有些人根据周边国家的情况

来判断。我觉得这个量级现在还不好判断。但是，这个产业链一旦搬动以后，再回来就比较难了。企业做这个决策都很纠结，但是这次的体验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小部分有迁移的趋势吧。

**乔依德:** 张明，你在绵阳那边挂职，有没有这种感觉？

**张明:** 在正常情况下，企业要搬动产业链会有很多的考量，尤其是对产业配套、要素供给、基础设施的考量。在这方面，中国相对一些潜在的竞争对手，还是有很多优势的。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大规模的产业外移。但是要小心，这次上海疫情的确导致了很多跨国公司，对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经济稳定有一些怀疑，有一些动摇。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坚定地稳定经济，坚定地畅通物流，坚定地要保证要素的供给。就像邵宇说的那样，做决策很艰难，但是决策一旦开始做了，往前走了之后，就很难回头了，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乔依德:** 我也看到有一个说法，即我们的防疫政策恐怕也要有一种考虑。特别是奥密克戎传播力

---

强，致死亡率比较低，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外面都开放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这方面，短期还可以，中长期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下面一个问题是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俄罗斯现在剥夺了股东的权力，由公司管理人宣布退出国外股市，回到俄罗斯股市，这对于我们国家的海外资本融资会有什么影响？

**邵宇：**我们没有专门研究。现在看起来，美国对俄罗斯的这轮制裁，有点像压力测试一样。现在中概股的谈判，还在谈着，但是进展有限，越来越多的企业列到了清单里。我觉得要准备迎接他们回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他们提供一个回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港股的衔接方案，可能更好一些。现在看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会更明确地表现出来，不会缓解，还是要做比较坏的打算。

**乔依德：**邵宇，你讲的是中概股在美国的上市。他这个问题是说：普京签订了一个法律，允许俄罗斯在国外的上市公司，不用股东讨论，就是管理人决定退市，给国外投资人一个收据，可以把它转化为俄罗斯的股票。这样一个做法，对我们会有什么

影响？俄罗斯这样一宣布，在国外上市的股价肯定下来，如果是俄罗斯是大股东的话，它的损失也很大。假定这个公司是俄罗斯公司，这样一宣布，估值下降肯定很厉害，所有股东的损失都很大。

**邵宇：**在伦敦上市的已经下来很多了，都跌的非常厉害，和中概股有一拼。没办法，因为这个方法本来就不是市场经济的方法。在两国冲突敌对的时候，这就类似于违约，它的冲击肯定是非常大的。

**张明：**我说两句吧，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这种做法的确是两败俱伤的非正常做法，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你可以想象，如果哪一天俄美冲突下降了，俄罗斯企业还想重返欧美市场，投资者会怎么看他们？对于我们来讲，别人怎么想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尽量不要率先采用这种非市场的方法。第二点，这两年大家看到中概股风雨飘摇的情况，绝对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以前写报告的时候，是把美国人做空中概股作为一个风险来提示，但是没有想到中概股暴跌是我们自己打响了第一枪。当前中概股退市的情况，会对我们未来

---

在海外做股权融资产生影响，而且会死一批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可以说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事业，会因为中概股的这个局面而受到重创，这也对我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未来的创新，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

**乔依德:** 张明，你这个补充，是很重要的。除了看别人以外，我们自己怎么想得更周全，做得更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下面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两位老师，如果中国经济在中期陷入滞胀，你对于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包括职业规划，投资建议，你们两位可能对这个问题更有发言权。

**邵宇:**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机会，哪怕是经济进入低增长，在结构上还是会有机会。美国几次陷入滞胀，整个经济是 1%-2% 增长的时候，也会有伟大的企业家出现。比如说，投资的行业或者企业，能不能抓到新的增长的脉络，而这个脉络可能无法按照以前的成功经验给出有效的指引，当然这个机会在哪里，就看未来我们在哪些方面作出部署。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机会和挑战，机会还是有的。

**张明：**对于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年轻人，的确现在不确定性在上升，在这个时候，三种能力非常重要的。第一，是持续学习的能力，过去我们构建的指示体系可能已经不太适用于新环境的要求，所以持续学习非常重要。第二，在动荡的时候，还是要培养国际化的能力，我不相信未来我们的开放之门就堵住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放眼全球，培养自己的国际网络，这点非常重要。第三，抗压能力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先不要把自己搞抑郁了，通过锻炼、阅读，要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如果现在你的观点比较悲观的话，是非常难受的。

**乔依德：**我补充一点。张明和邵宇，他们本身在职业生涯中，也是很成功的。这里可能有一个启示，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据我所知，张明以前也有其他机会，在财务方面可能更吸引人，但是他不为所动，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宏观经济。我想，对30岁的年轻人，职业规划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一段时间来，中央是不是对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有所修正？

---

比如应对疫情的做法。你们两位是怎么看的？

**邵宇：**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在调整，包括防疫政策第 9 版方案，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我觉得还是要用数据和科学来证明这个方法可行，同时也要做一个托底的安排。比如说，上海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概有 30%。在谈到一个人一个人的 case 的时候，大家肯定比较感性，比较冲动。但是决策者还是要根据科学的数据判断。我觉得其实会调整，也在调整，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吧。决策者会权衡经济发展，包括各种代价，这是一个不断的适应和再适应的过程。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仅供参考。

**张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现在看中央的政策，我觉得有两句话很重要，第一句话叫“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央对目前全球局势的判断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 2018 年以后，首先是中美博弈，然后是全球疫情，然后是俄乌冲突。统筹发展和安全，和单纯的关注发展的政策框架，一些政策的偏好可能有些不一样。但是第二句话我觉得更重要，“发展是最大的安全”。对中国这样一个发

展中国家来说，离开了发展去谈安全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确保经济能够持续较快地增长，只有确保微观主体能够持续地获得福利，只有确保不爆发重大的系统性风险，才是我们崛起所必须的。所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但是发展是最大的安全，我觉得这两句话是在我们评价当前的政策的时候，应该非常关注的。

**乔依德：**对这个问题，我补充一点。我想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原因是在于去年有一些政策，可能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双减，对房地产的打压等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的很明确，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可能都是好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合成谬误，每个政策好像都好，但是叠加在一起的效果可能是负面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发展是我们执政党的第一要务。特别是金融工作会议又强调了这一点。我想，应该还是要有信心。我最近看了国外一个研究者的文章，他以前在国内也呆过，现在在美国做研究。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人或者中国的决策者是比较实在的，或者说比较讲实务的。他说会做调整，好几次

---

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得不对，但是碰壁以后会再做调整，他相信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会做一些调整的。时间也不多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人问，美联储说规则改变了，不知道这个规则改变是指什么？是指最近加息，推出货币宽松货币政策吗？这对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怎么应对？

**张明：**我觉得他问的，可能还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转变，就是以前CPI看2%，后来CPI看平均2%。我觉得这个最近意义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产生规则的原因是，如果通胀持续偏低的话，美联储会进一步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使通胀略有复苏，也不必很快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今年以来的情况是，CPI上得太快了，现在已经超过8了。在这个情况下，无论是以前老的货币政策目标，还是新的货币政策目标，都不管用了，都需要连续地收紧货币政策。从连续收紧货币政策来讲，对全球肯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风险资产价格的下行，波动性的加大，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的外流，本币的贬值压力，新兴市场可能被

迫加息，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上演的。我就讲这么多。

**乔依德：**邵宇，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你们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做了较长时间的跟踪，你对这个问题谈谈看法吧。

**邵宇：**美联储政策框架的整个逻辑在哪里呢？CPI看2%是基于过去30年，中国巨大的产能，特别是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当然这里面除了要素成本以外，还有汇率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框架已经很明显的不再管用了，中国也没有人口红利了。还有绿色通胀的问题，就是你要双减，要转型，绿色通胀加在一块。再加上供应链的问题，以及全球化的问题。CPI可能不是平均2了，可能平均4。要调整以前的泰勒规则的话，调整肯定来的比较慢的。他们一直在说通胀是暂时的，平均2也能接受，以前是超过2就开始加息，现在已经是7-8了。美联储的实际操作就很慌乱，迅速的加。2008年那次，我记得三年加了7次，现在是一年加7次，而且有的加到50个BP。这样的一个调整，可能绝大部分投资人还没有意识到。我觉得要观

---

察，实物资产，保值类资产，可能也不一样了，波动肯定在所难免，大概就这些。

**赵广彬：**我还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吗？张明你刚才讲说，二季度 GDP 可能是 2 到 3，这个观点能不能展开说一下？因为现在快到 4 月底了，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你是怎么作出这个判断的？

**张明：**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没有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的防疫政策也没有任何调整。在这个情况下，4 月份肯定很惨淡，很多东西是有延续性的，4 月份的冲击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可能会延续到 5 月份。我举个例子，我在内陆省份，我这里的城市都发现很多企业，因为上海港被封住了，关键的原材料运不进来，影响下一阶段开工，很多生产线都停掉了。另外，上海港主要是负责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所以现在很多机电行业的企业出口出不去。我之所以做偏低的预测，有几个假设，第一个是宏观政策没有调整，第二个是防疫政策没有调整，第三个是疫情没有明显的好转，基于这三条得到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当然我们希望政策能放松和调整，导致二季度增速还能够维持到 4% 以上。

**乔依德:** 好的。非常感谢张明和邵宇两位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发言，而且对我们听众提的很多问题做了详细的讲解，对我们理解短期或中期的中国经济都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的视频研讨会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所有参会的人，我们希望疫情能够早一点借助，下一次我们能够在线下开会，和大家见面。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 黄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
- 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刘洪钟**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 徐明棋** 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系列座谈会第 69 期 2022 年 5 月 19 日

**杨成**（主持人，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各位老师和嘉宾好。美联储的加息缩表以及当前的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有很大影响。我们和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乔依德秘书长商量了一下，就组织了今天这样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请了几位老师来做主旨发言，每个人应该都有 15-20 分钟，还会有一些问答。首先我们有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先生来做主旨演讲，他发

言的题目是“美国内政与美联储加息缩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有请黄老师。

## **黄靖：美国内政与美联储加息缩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从美国方面看，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这次缩表有用，但为时太晚，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这次缩表够激烈，在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银行拆借利率会到达3%甚至更高，这将对美国经济有一定向好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并没收了俄在美资产，使得美元信用和美国商业信誉产生巨大损失，各国都会改变外汇储备结构和持有方式，财富的持有者也会不同程度地“去美元”以避险，结果导致缩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几种观点给美国决策层和资本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缩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通货膨胀和超发货币。

---

尽管拜登在竞选时口口声声表示去特朗普化，但在金融政策上，事实上延续了特朗普政策。不仅没有停止增发货币，反而为了防止经济下滑、保护自己的执政环境，持续性增发货币。而且，在高通胀已经形成后，决策依然迟疑不决。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深度分裂导致政治两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任何（国内）政策议题上都势同水火，极大地降低了决策的效率和效果。而且，拜登政府内部也不团结。拜登的内阁成员几乎全是拜登和奥巴马团队的人，希拉里团队的人被排斥在外。内阁成员中自由主义倾向明显，但战略派与技术官僚之间矛盾很深。而拜登当选后，为了强化自己团队的掌控力对主要内阁任命做了较大调整，结果进一步弱化了自己的政府，比如国务卿、国安顾问和防长都比较弱势。

因此，拜登政府在决策方面表现得非常混乱，往往是说到做不到，或者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往往以非常强硬的姿态掩盖实际上比较理性的，甚至是妥协性的政策。比如前不久用情报机构搞疫情追责，其实是为了金蝉脱

壳，摆脱共和党的压力，又比如宣布要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实际上却是为了掩盖取消贸易战、接受美国企业与中国贸易的降税申请。在缩表问题上也是举棋不定。一方面拜登团队怕缩表政策损害大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团队的“四驾马车”——耶伦、戴琪、雷蒙斯和鲍威尔——互相之间意见相左。此外，在缩表和对俄罗斯采取全面极限制裁问题上，拜登政府内部显然没有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沟通。这导致对俄罗斯制裁的反效果——尤其是在金融方面——比预期大得多。而且，为了堵住共和党反对派之口、为中期大选获取资本，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一开始就全面压上不留后手，如今缺乏后力，能用的手段都用光了。而且，此次对俄制裁，尤其是美元武器化极大地打击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外汇储备的信心，使得整个外汇储备的结构和形式都将有一个大的变革。而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缩表开始后，更多的国家不愿购买美债，使得拜登政府的缩表法更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应该通盘客观地思考中国的应对措施。必须看到，当下中美之间最切实的

---

共同利益就是维护全球的金融稳定。毫无疑问，全球金融稳定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金融不稳定最大的输家是美国。然而，作为第一贸易大国，2021年中国GDP的35%来自对外贸易，中国出口总额是世界出口总额的15%（美国和德国分别是8%和7.6%），全球60%的贸易与中国有关，但只有2.6%的贸易是以人民币支付。而且，在全世界12.8万亿的外汇储备中（中国外汇储备3.4万亿，世界第一），美元占60%，人民币只占2.7%。可见，在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之前，如果世界金融体系不稳定甚至发生危机，如果去美元化来得太快，对中国没有好处。前不久世界一揽子货币中增加了人民币的权重，同时也增加了美元的权重，这表明中美分担更大责任的趋势。维护世界金融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问题是应以怎样的形式与美国进行合作，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伤害。

总而言之，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美国对俄的金融制裁增大了美国加息缩表的困难，增大了美元缩表带来的负面效应。但缩表不纯粹是美国的事。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客观地判断其利弊。

在缩表带来的动荡中，中美合作是可以双赢的。而且，应该积极思考金融重地上海、香港应该怎么做，怎么互相配合。

**杨成：**我们下面讨论价值链的问题，有请华东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余南平教授，余老师请。

## **余南平：俄乌冲突之后地缘政治变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和影响**

**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乌冲突这一事件是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会影响方方面面，比如，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开展制裁后对全球供应链就产生了成本上升的影响。除此之外，它产生的另外一个层面影响就是世界越来越趋向于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原来是在全球互联网结构下发展全球价值链，每个国家都是节点；而现在就可能变成分布式结构的互联网。集团化是指几个分布式的局域网各自循环，当前已经具有相互切割的趋势，但全球价值链的整

体切割仍是缓慢的过程。

从生产制造端看，突发的疫情对于我们而言，的确是给了我们两年多的一个窗口期，它使得我们在过去两年对美出口，尤其去年我们对美、对欧、对东盟的出口增长非常迅速。原因在于，美国在构建联盟和价值链切割的过程中，在产业领域受到了阻碍。美国本土具备恢复制造端的资本和技术，但是缺乏合适的劳动力，其在短期内实现对制造业的支撑显然是不可能的。多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供给结构已经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这使得从奥巴马任期内就开始倡导的制造业回流困难重重。因此美国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替代中国的产地，而印度原本应该是美国的首选，但是这两年以来印度也受疫情影响，波折不断。虽然，印度人口众多，但其工业生产体系仍在建立中，使得我们国家有了两年多的缓冲期。

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美元的超发，包括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行为，使美元遭遇了一定的信任危机，但美元指数依然上涨，目前位居 100 以上的高位，而其他主要货币都在跌，金融市场认为世界上

目前还是找不到比美元更好的资产。而俄乌战争进一步推动了美元非避险功能，助长了美元的强势。从舆论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显然认定中俄是一个集团或准集团，原因在于中俄之间事实上的经济基础存在，使得俄罗斯敢于采取这样大胆的行动。暂且将乌克兰危机的历史根源放在一边，当前西方已经形成共同的“政治正确”认识，即不制裁俄罗斯就是政治不正确。而为了制裁俄罗斯，就要做出适度的牺牲。目前的政治态势是将安全排第一，把经济往后靠。比如，德国一开始反复表态不能切断俄罗斯能源供应，而现在则转变态度说可以切断，但需要时间和各国的协调。当然在此次危机中，整个欧盟承担了制裁俄罗斯的最大成本，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安全上的。虽然欧元明显走弱，但欧洲也坦然面对了。

从能源供应端来看，当前全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源结构性的不平衡。西方在短期内拿出这么多能源来填补俄罗斯的供应缺口，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美国加大开采液化天然气，或在中东等其他地方寻找替代能源，也需要时间。但是在政治正确的

---

压力下，西方人觉得付出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这个全球价值链出现了新变数，具体是指欧洲潜意识上已经把我们开始划入另一个阵营。在寻求欧洲新能源产业链建设上，并没有特别加强与具有组件优势的中国企业合作。

从战略竞争端看，美国目前也在重新评估印太战略。我认为在印太战略处理上美国正在进行转向。对于东盟而言，当然不愿意失去两方的市场。从市场结构上看，中国和东盟在争夺美国市场上是竞争的关系，具有相互替代效应，而如果从产业链角度讲，中国与东盟存在一定的上下游关系，投资、设备和配件、附件生产方面中国与东盟都有复杂性的嵌套关系。美国目前的转向也很清晰，对印度抱有的较高的产出期望，可能暂时落空，因此，美国要抓紧时间拉拢东盟，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我认为这是美国在反复评估后的一个新动作。在原本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美国遗漏了韩国。最近，拜登访问韩国和日本，希望构建紧密关系。而韩国目前的政治倾向恰好本身比较亲美，而且希望对北朝鲜采取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印太经济框架逐步扩容，强化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基础，这个可以看成是美国在 TPP 以后重新设计的框架。从战略角度来讲，美国的谋划比较长远，虽然，对于这个框架的运作结果还要看未来。但是，我认为美国已经改变策略，其采用了模块化策略取代大多边的集成战略。

模块化的概念可以这样理解：类似于安卓操作系统结构，这个操作系统的整体架构是由美国设计，里面的各类应用软件只要符合美国的操作标准就可以进行灵活组合。进一步从供应链。或者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讲，美国可以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将制造业向亚洲倾斜，印度无力承担的部分可以由东盟国家分结构承担。而东盟国家的角色显然是不同的，从全球位置来看，新加坡目前已经成为金融和资本，技术研发角度最有利的区域，未来会有大量研发中心乃至亚太总部可能会往新加坡迁移。但是，新加坡的容量决定了它无力承担这么多的制造业，它的杠杆作用仅体现在金融、服务业、高端研发上。那么未来越南就可能从中更多获利，人口较

多，并且正好处在工业化的上升期，因此，其可能在印太战略经济框架中成为日本和韩国的下游，承接美国的大量订单，同时自身也完成初级产品订单。越南的情况也可以拷贝到印太经济框架其他参与国家。

从市场范围和空间角度看，当前在美国市场售卖的产品里面，有很多都是来自洪都拉斯、秘鲁等一些制造业水平较差的国家，从服装行业来看，其面料水平与中国仍有距离，但是美国宁可降低品质，也要分散采购。将全球价值链本身做了一个带有意识形态背景的切割。全球生产包括原材料产地、制造国和消费国三块，从原材料角度讲，美国和欧盟都想要把俄罗斯彻底从这个全球能源市场踢出去，俄罗斯可以供应自己的朋友，但是西方世界并不接受俄罗斯的供应，所以将来能源供应链是区域割裂的，而全球制成品可能要忍受价格的上涨，这就是意识形态背景的市场结构。

我认为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对印太战略的转向后的市场空间扩张。再放到大一点的悲观角度来讲，如果将来的全球化要按照两套生态体系进行，

那么这个中间地带或者说有交集的地带就会发生在东南亚。从冷战的经验来看，市场范围和空间非常重要。美苏冷战时，俄罗斯和前苏东地区大约有3亿多的人口。而欧洲和美国，连同其控制下的亚洲、美洲市场有十多亿人口，大约有1:4的这么一个体量水平的内部市场再循环。因此，博弈和竞争结果更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空间越大，为技术进步提供的研发机会也会越大，体系循环也越有效。因此，未来印太经济框架与我们将聚焦于市场空间和范围的竞争，这是真正的核心问题。

从地缘格局上看，美国在过去的两年中的“印太战略”推进中，明显冷落了东盟，而现在东盟美国特别峰会刚刚结束，美国拿出1.5亿美元，让东盟国家自行探讨如何合作。虽然这个金额被国内许多评论嘲笑，认为掀不起大浪。但不能忘记了，美国的真正诱惑在于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强劲的购买力，当然还有资金与技术，这对东盟国家来讲就是选择道路的问题。国内许多人目前看不上拜登团队，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清晰的战略。但事实上，当前拜登的团队在战略谋划和执行力上并不弱，其

模块化战略运作也开始成熟起来。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不怕跟中国决裂，那就选政治与安全模块；日本、韩国技术强，就参与技术合作模块；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需要市场，又不想得罪中国，那就选经济模块，美国并不要求所有国家都进行政治站队。因此，从未来的价值链的结构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切割且对中国有杀伤力的做法，这等于说从政治、经济、技术、意识形态进行了模块化联盟再组合，可以形成生态和系统性优势。

另一方面在于欧盟，欧盟本来就试图推进战略自主，想打造自己的未来高端竞争性产业链。而此次正好借俄乌冲突机会，将碳减排和欧盟能源独立的双向目标结合了。近段时间，欧盟发布了新一轮的太阳能计划，包括对海上风电计划加大投资。而在这个产业链的设计中加入了一条“强迫劳动”条款，其目标就是暗指中国的新疆，因为新疆生产大量的太阳能硅片，也是中国较大的太阳能配件生产基地。而欧盟是否会进一步对新疆产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当然还有待于观察。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全球价值链的鼎盛高峰期已经结束，无法在当下的

环境中更加进行深化或者细分产业，只能区域化和本土化的重新部署和整合。全球价值链将会向分布式网络收缩、在全网功能下降的趋势下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美西方联合起来针对俄罗斯的能源价值链进行打击，试图在全球能源价值链中屏蔽俄罗斯这个网络节点，禁止俄罗斯的售卖，这相当于实施了网络节点屏蔽式的网络攻击方法，也是一种具有杀伤力的新手段。

因此，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疫情反复带来的影响使我们面对的压力明显增大。此次国内疫情散发，包括上海疫情的影响，对整个经济打击最大的还是中低层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许多中小型实体经济、服务业企业在疫情期间倒闭，重建和恢复的过程需要时间和信心。现在单独依靠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可以拉动一部分的 GDP，但是无法改善本质上的消费驱动力，目前贷款也下跌严重，老百姓不愿意花钱，而国内全部恢复正常后，是否能够再像以往一样乐观地工作或消费，尚需要进行观察。现实地看，在闭环中实现复工复产是有相当难度的，这对经济内循环的考验极大。产业链与供应

---

链的运行与教学完全不同，比如说你今天有特殊原因不能上课了，跟教务说调整时间，这不影响什么。但是生产流程是一分钟都不能停，一个配件不能少的。因此，疫情对生产的阻断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海外订单并不会不等人，目前有些订单已经开始急速往东南亚转移了，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而这与我们以往碰到的金融危机局面，包括美国对华贸易战碰到的问题完全不同。

必须要重视的是，目前全球合作意愿的下降，比如说今年的 G20 峰会就难以再找到共同的主题，各国对共同维护经济增长的意见不一，各国共同发展数字经济的标准也不同，对话空间极具萎缩，最后也可能只能看自己的循环体量了。而对中国来说，如果不能马上恢复正常生产，且进一步采取扩大开放的策略，那么我们的外循环就会遇到大问题，并反过来影响内循环。我一直认为，客观地看，经济博弈美国并非不擅长，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市场杠杆和让利的问题，以往在全球自由市场实践中比较困难。但现在通过政治与安全借口，美国可以将市场变成了一种定向的购买补贴工具，即便

有一定经济的代价也要打击竞争对手。而通过此次俄乌冲突后的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包括美国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都可以看到美西方还是秉持了政治正确并可以承受一定的经济成本，这是国际政治的目前现状。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已经开始逐渐成形了，其通过模块组合来有效打击，产生一个强大的反华和遏华生态，联盟中的每个国家都在其中承担一部分，美国只要扶持这些国家，就是在削弱竞争对手。而在这个结构中，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日韩和欧洲在高端技术上与中国价值链切割。以往日韩、欧洲和中国有深度的经济利益捆绑，而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变化，中日韩的技术合作在减少，同时欧洲新产业链对中国也在挤出，这对于我国的技术进步是重大打击。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营造一个扩大开放的空间和环境氛围，而窗口期一旦失去，对我国的未来影响会很大。

**杨成：**谢谢南平。下面我们有请上海全球治理区普遍研究院刘洪忠教授，也是围绕产业链价值链

---

来展开，刘老师请。

## **刘洪钟：多重不确定性背景下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及对中国影响**

**刘洪钟**（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我今天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第二，多重风险背景下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第三，关于中国如何应对的几点思考。

尽管俄罗斯占全球 GDP 不到 2%，乌克兰占全球 GDP 不到 1%，但从结构层面看，俄乌冲突在一些重要领域会对全球供应链形成巨大影响，包括能源（油气）、农产品和半导体三大领域，并对物流产生冲击。其中对物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领空关闭后，从中国空运到欧洲的货物可能需要改道或使用更慢、更昂贵的运输方式，据 UNCTAD 估算，受俄乌冲突影响，物流价格总体上涨 1.5%。；二是欧洲路线的阻滞将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造成严重损害。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并非始于俄乌冲突，从 2016 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实际上就已出现苗头。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三大风险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其未来重构：一是从准时制（just in time）向“以防万一”（just in case）的转变，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三大效应：牛鞭效应、区域化和“中国+1”。二是从供应链“弹性”向供应链“主权”的转变，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将是使其超越经济领域，演变为一场以中美为首的基于价值观的两大供应链集团的对立。

西方近几年对半导体领域重视程度不断上升。

美国方面，2021 年 2 月 24 日拜登总统签发供应链行政命令，启动了一项全面的机构间审查，以识别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供应链中的风险。2021 年 6 月 8 日，拜登政府宣布了最初的 100 天供应链审查结果，并发布了四份跨机构报告，全面审查了广泛的供应链风险，并确定了五个主要漏洞来源。2022 年 2 月 24 日，拜登政府发布所谓的顶石报告，宣布了加强关键供应链并投资美国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具体计划，同时国务

---

院七个机构还发布了六份报告，概述了易受影响的关键领域以及联邦政府可以采取的加强美国关键工业基础部门供应链的具体政策。

欧洲方面，2022年3月冯德莱恩宣布《欧洲芯片法案》，在现有300亿欧元公共投资基础上额外增加150亿欧元，目标是到2030年将芯片制造全球占比从9%提高到20%。

日本方面，从2020年至今也在一步一步推进半导体产业政策。2021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扩大国内半导体生产能力为目标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2021年11月15日，经济产业省提出有关强化日本半导体产业基础的“三步走”实施方案；2022年5月11日，日本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旨在保障半导体和医药品等“特定重要物资”的供应链稳定，赋予政府对企业供应商进行调查的权力。

从日本、欧盟、美国的行动可见，半导体未来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行为，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联合作。

此外，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在半导体领域的合

作正稳步推进。在印太战略下，有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QUAD 等机制建设。在企业合作层面，2021年5月11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64家企业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其使命是通过推进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来帮助支持美国的经济、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

最后，我想就中国如何应对谈两点思考。第一，中国短期无忧，长期困难，要争取未来3-5年的窗口期，不要让“中国+1”中的“1”越做越大形成规模。第二，要更深入、更大范围的开放以争取欧洲、日韩和东盟。尤其在中美激烈竞争下，欧洲，日韩和东盟将是我们努力的重点方向。说中国短期无忧是由于目前中国是全球半导体消费最大的国家（60%），但恐怕占比已经触顶。未来随着美国、欧洲、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规模扩大，消费逐渐外流，会对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形成不利影响，我们应予以警惕。七、八十年代日本的教训应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杨成:** 好的，非常感谢洪忠老师。下面我们有

---

请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棋老师来发表他的高见，他主要谈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徐老师有请。

## 徐明棋：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徐明棋**（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我围绕着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谈一点看法。我认为俄乌军事冲突总体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负面冲击。

第一个导致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变得更加困难。第二个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的高涨，全球化受到严重的打击。第三个是导致自从 2008 年来在国际社会逐步形成的全球治理遭到破坏，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国际机制，比如 G20 遭受了重创，陷入困境。

对全球经济的增长的负面影响，应该来说知识界、经济界都有了基本的共识，我大概归纳了一下，那么有这么几个渠道，冲击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前景。

一是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导致通胀难以驾驭，目前已经在高位徘徊。我记得三四年之前，上海发展研究基金开会讨论，大家都在问经济增长低迷，同时通胀比较低，刺激不起作用，钱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当时在会上我曾经发言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导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最终将会导致通货膨胀。

现在通货膨胀终于来了，受到疫情冲击后的全球经济复苏有了很多的变数，风险在加大。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毫无疑问会使通胀雪上加霜。因为俄罗斯是第二大的原油出口国，也是第二大的粮食出口国，乌克兰也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俄罗斯还是与粮食生产有紧密关系的化肥出口国。能源粮食基础性商品涨价，通胀进一步高企，必然导致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受到打击。

二是俄乌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在公司层面，在国家层面，对全球未来经济增长的悲观的情绪，悲观的预期会引发投资贸易活动受到抑制，因为风

---

险在加大，投资贸易都会受到影响。IMF 已经下调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下半年还会进一步的下调。尤其是对欧洲的经济增长的预期很悲观，现在欧盟自己预测它的经济增长仍然会在 3% 以上，但我估计下半年很可能会下调到 3% 以下。有些金融甚至开始预测欧盟 2022 年欧盟会出现衰退。美国也是如此，美联储如果货币政策因通胀上升而加快货币政策的转向，也有可能导致接下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被打断。所以说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会导致全球经济未来负面的预期悲观的情绪加大，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三是直接通过贸易的萎缩导致全球经济下滑。贸易的萎缩不仅是俄罗斯、乌克兰在全球的能源粮食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因为战争其贸易已经受损，而且还因为金融制裁导致很多与俄罗斯有着贸易关系的国家，他们与俄罗斯开展的贸易也受到不利一个冲击，整个全球支付的格局现在正在进入重组和调整的新周期。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印度停止了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印度给出的理由受到金融的制裁，导致支付没法完成。金融制

裁会进一步的导致全球贸易的收缩，从而对全球的复苏，经济的扩张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四金融市场的风险动荡进一步加剧。金融制裁本身导致美元信誉开始遭受一些国家的怀疑质疑，那么当然美元的霸权地位不至于马上遭受严重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 IMF 把 SDR 的货币篮子做了调整，很多人看到中国的权重在提高，实际上提高的最多的是美元，从 41.73% 增加到了 43.38%，上升了 1.65%，而中国的人民币从 10.92% 上升到 12.28%，也上升了 1.36%，欧元则下调了 1.62%，基本上都给了美元，日元英镑下调了大概 1.39%，其中的 1.36% 给了人民币，另外 0.03% 是给了美元，所以说美元仍然是霸主。

但不管如何，金融制裁对很多国家而言产生了要避免规避潜在金融制裁风险的需求，要对他们的国际资产配置会进行重新的评估和配置；跨国公司也会据此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资产的重新配置。于是，随着这些调整和资产重新配置的进行，全球的金融市场会进入一个更加动荡，更加不稳的局面。我们已经看到美欧的股市大幅度波动和美联储货币

---

政策转向引起的市场震荡，叠加上金融制裁所带来的风险重新评估、重新定价的一系列的的操作，对全球的金融稳定它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欧洲的很多金融机构，它在俄罗斯的风险暴露，不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财务报表上的亏损，欧洲的金融的脆弱性进一步的暴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欧洲发生金融的危机，或者说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加剧，传导到全球的金融市场上，必然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所以说总体上而看，在本来就已经受通胀导致的美欧货币政策转向大背景之下，在周期的因素的调整的大背景之下，世界增长和复苏变得困难，俄乌军事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具有叠加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方面影响我想谈的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另一个影响，就是导致主逆全球化的加剧，实际上也表现在好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西方国家现在以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跨国公司

在这个时候也必须要讲究政治正确，不得不选边站。他们在全球的投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布局，就不仅仅只是考虑利润和效率，而是会在政治正确，地缘政治风险最小这些因素和区域来布局。现在很多搞战略学者都在担心未来全球是否会分化成两个集团，一个是美国欧盟领导的西方产业链供应链联盟和市场，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一些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平行市场。我没有那么悲观，我也不认为会形成这两个截然处在竞争状态的对峙的不同的集团和平行市场。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产业上，原来的全球的供应链可能的确会碎片化，甚至分化成所谓的友好国家的供应链集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逆全球化的过程，因为原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的配置，注重的是效率优先？哪里成本最低，哪里可能获得的潜在的收益最大，它的生产链供应链就布局在哪个区域。现在他要考虑地缘政治冲突，考虑政治的正确性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这意味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增强，导致全球化受到更大的阻力。

第二个层面与此相关的就是金融的制裁。我认为对全球经济的主要的影响，除了我刚刚谈到的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之外，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推动逆全球化进一步的高涨。为什么？因为很多金融市场，尤其新兴市场国家，即非西方国家的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在内感到担忧，连印度也感到担忧。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推动很多区域的双边的支付的安排，以及金融的集团化的倾向。经济全球化有两大动力，一是跨公司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在全球从事生产经营。二就是资金在全球自由的流动。如果现在全球的资本因为西方的制裁延伸出来的政治风险，地缘冲突的这些风险，导致变成集团化、友好国家内部流动，那么它就会阻止全球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生产流通都会变得更加不利。失去了资本的全球的流动，全球化就无从进一步的发展，逆全球化就会进一步上升。

我要谈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这是对全球治理的一个重创。现在 G20 今年峰会怎么开都不知道，美国已经明确说如果邀请俄罗斯，美国就不参加。印度尼西亚作为主办国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境

地，印尼现在已经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了平衡，又把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但是能否开成它还是一个未知数。即便如果形式上开成了今年的 G20 峰会，要想取得有效的全球治理成果也是很难的。比如，今年的峰会以什么为主题？原来主题很清楚，疫情冲击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对最穷的非洲国家落后的国家提供援助，让他们迅速的走向复苏，这些都重要的议题。现在这些议题被俄乌冲突冲淡化了。原来所谓的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能够逐步地搭建起来，G20 在当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无论东方、西方、俄罗斯、中国和美国、欧洲，都看到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的挑战，使得我们的共同利益受损，为了全球人类共同发展的利益，我们先要把我们的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制度上分歧和冲突搁置起来，共同努力来应对全球挑战。

而现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上升为主要国家都在优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来应对，全球经济的治理就变得次要了。G20 这类平台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变得困难了。比如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立了国际

---

金融稳定理事会，对全球系统性的主要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的管理框架。在贸易上原来也要推动 WTO 的改革，对一些条款进行修订。现在俄罗斯都准备要退出 WTO。全球的治理怎么能够缺少这些主要的国家的参与？

最后我想谈一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下俄乌军事冲突这一重要事件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虽然不是俄乌冲突的当事方，但是我们经济遭受的不利的冲击并不轻。因为中国是石油和粮食的第一大进口国。俄罗斯受到冲击，粮食能源的出口未必会下降，但是价格上涨是中国要承担的高额的成本。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2021 年中国进口了 5.13 亿吨的石油，2021 年国际石油的均价为 70 多美元一桶，上半年是很低的，四五十美元，到了下半年开始涨，涨到最高的 80 多元，全年平均 70 美元一桶。现在因俄乌冲突影响，稳定维持在 110 美元以上。以去年年中国进口的石油的规模计算，今年就要多付出多 1000 多亿美元。根据海关统计的数据

显示，2021年天然气进口价格平均为350美元一吨，我们2021年进口了1.2亿吨的天然气。2022年1-4月份天然气的价格涨了一倍多，如果以2021年进口额推算，中国2022年进口天然气也将多付400多亿美元。还有粮食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中国都是最主要的进口国，价格上涨都会推高中国的进口成本，中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就非常大。前面有人提到中国的PPI在高位运行，我估计到了下半年战争不结束，大宗商品的价格不回调，那么这个PPI一定会向CPI传导。尽管我们生产商已经通过自己勒紧裤腰带消化各种成本，减少了向下游，向制成品和消费品传递的压力，但是PPI传导至CPI的压力下半年会明显上升。

第二个就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产业的布局和经济的增长，很多跨国公司它现在也要政治正确，在规避地缘政治冲突风险时，会把把亚太地区未来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当成是一个重要的风险，从而向外转移产业链和供应链。再加上我们最近的抗击疫情的封控措施，外资产业转移的动机加大。总之，俄乌冲突和疫情扩散导致产

---

业链调整对我们的压力需要认真应对。

第三是反华媒体的鼓动之下，使得中国在西方的舆论当中，以及在西方政治家的头脑当中，已经变成了和俄罗斯一样是未来潜在的敌人，或者说的轻一点，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现在西方媒体宣称西方面临的威胁 **Today is Russia, tomorrow is China**。这种舆论的传播使得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虽然我们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没有上限，但是我们是**有底线**的，但西方只看到没有上限之说，而且不断重复引用中俄合作没有上限，并以此对中国施压。

4月1号，习主席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视频对话，习主席强调中欧有着共同的利益，战略伙伴关系要维持，但是欧方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一点，就是中国在俄乌冲突上的表态。欧盟发出了比较强烈的信号，即中国如果被**发现**资助俄罗斯绕过西方的金融制裁，欧盟将**严重地**看待中欧关系，也就意味着发出威胁的信号。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做欧盟工作，改善中欧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四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西方舆论甚至把俄乌冲突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使中国处在一个被动的境地。尽管中国官方一再强调台湾与乌克兰完全不具有可比性，一个是中国国内的内政问题，一个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但是西方很多反华的势力，他们诚心想搞乱当中的界限，引导亚太国家采取一些对我们不利的行动。虽然亚太国家采取的一些行动也未必完全是站在美欧或者是美国这一边，但是对于有些也属于规避风险一类。但是美国利用俄欧冲突团结西方，团结整个西方，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接下来美国要做的就是将北约变成一个全球的西方的军事联盟，引导到亚太地区，甚至把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纳入到北约的框架当中。

亚太地区的国家看到这个趋势，未必真会下决心与中国为敌，但是它会看到亚太区域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他们和中国的很多贸易投资的合作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利的影晌。所以我认为，俄乌冲突短期内对我们的不利影晌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原来的估计。

当然我也不是说非常悲观。其实我非常赞同刚

---

刚前面很多专家已经提到的，最关键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应对，因为机会仍然是有的。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定力，秉持真正的对外开放，推动合作共赢，我想我们仍然是有机会维护好我们外部环境，减少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这些前面所讲到的这些负面冲击和影响。

大家现在忙于关注俄乌冲突，其实是给中国留下了很多推动经济合作的机会和空间。无论是非洲、拉美，包括我们周边的东盟，其实并不想涉入到俄乌冲突当中去。我参加的各种视频会议，很多国家的学者和官员私下表达了与中国类似的观点，但是受制于美欧加在一起的大市场，以及在技术经济上的相对来说领先的地位，包括美元在国际金融当中的霸主垄断地位，他们也不愿意得罪西方国家。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推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的合作，来扩大共同的经济利益。

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刚刚大家都提到美国现在正在搞的印太经济框架，好像美国原来忽略了东盟，其实美国从来没忽略过东盟，只不过没有找到抓手。中国与东盟有自贸区协议，现在东亚有签署

了 RCEP，中国还准备加入 CPTPP。美国是不可能加入到这两个框架当中的，拜登政府要想方设法找出美国能够团结这些国家，又能够避开国内的重商主义情绪所导致的，不愿意扩大自由贸易限制。所以，他现在搞了这个印太经济框架，什么产业链，什么科技的合作，包括甚至要把出口管制等等这些放进去，目的毫无疑问是想限制中国。亚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现在都已经宣布要加入，但是他们此同时也表达了非常清晰的对美国的要求，就是如果缺少市场准入，缺少市场进一步的开放，这些国家是会失望的。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是有能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国内的市场开放程度，加强与东亚国家合作。

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讲比较多，很多具体的开放措施在我们推动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当中，也同时加强了政府的规制和管制。外界就片面地解读成我们从开放往后后退了。我们现在一般性不再讲扩大对外开放，我们现在讲提升对开放的水平，讲制度型开放。毫无疑问，在制度构建当中，一条少不了的内容是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监管。当然这

---

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比如说反垄断，比如说反不正当竞争，比如说反侵害国家安全等这些经营的行为，当然是要监管。但问题是你在做这些制度构建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很好的宣传，没有很好的相关政策配套措施，外资在感受上觉得中国是不是在收了？如果我们在构建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时，同时关注外企业在中国从事投资经营的感受，不影响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成本，那么他的评价就不会那么负面。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要真正找到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些标志性的政策措施，来改变俄乌冲突对我们形成的地缘政治的不利影响，来改变上海以及很多沿海城市封控了两个月以后，导致外资企业感受上不利影响。

虽然这样做难度是存在的，但并非不可为。我们可以做一些重要的政策调整来改变外部世界以及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看法，维护我们整体的对外经济的环境，保证我们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顺畅。我认为，中国还是有希望维持外部环境，保持良性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我今天就讲这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不在这里展开来讨论了。

**杨成:**您刚才特别提到一个观点,说这未来可能不一定是平行世界,有可能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能不能把这一部分再稍微展示一下,为什么您认为更多可能是一个碎片化的,而不是一个平行体系?

**徐明棋:**中国和俄罗斯无法构造完整的一个供应链,也无法拉到足够的国家加入到我们主导的供应链体系里。西方国家试图在高科技领域,在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性的、在地缘政治冲突和竞争当中重要的、他们现在仍然具有领先地位的这些产业上和中国脱钩,不让中国追赶。但是它并不是在所有的产业上与中国脱钩。它斩断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式会呈现出非常多样化的一种格局。

另外我们国内主导性的理论,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构建起我们自己的能够控制的产业链,甚至在一带一路国家构建出一个独立于全球产业链,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产业链。我认为这个是错误的。你想想看这种思路指导指之下你的产业链的构建,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从上游设计到核心的技术,然后一直到最终的产品,都能够由你自己控制,这样一个产

---

业链体系，它最后也会表现出碎片化。

这两种势力或者说多种势力对冲的结果，它就会变成一个碎片化、或者立体化产业链的布局。另外我也不认可产业链分工应该向两端转移的说法。提升我们在产业链当中控制力，向两端转移一直是政策目标，因为产业链用价值来衡量就是所谓的价值链，价值链常常被描绘成微笑曲线。

其实所有的参与到国际分工的体系当中的国家地区，在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取决于比较优势，你只有去改变你的比较优势，让你的比较优势变成你所具有的垄断优势，就能够获得更高的价值分工。你不管在哪个端，在生产端、加工端，还是在市场开拓端、研发端，你都可以获得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收益。并不是说在加工端，在生产端一定就是低收益，这个曲线有可能是平行的。

比如说鸿海为一些著名手机生产商加工，台积电为美国的主要的芯片设计者制造商加工芯片，设计是人家的，但设计不能有效地以低成本造出来，那么鸿海、台积电在加工端具有的垄断性优势，就使得它加工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在一定程度上

你加入到产业链当中，你具有的地位非常特殊，具有不可替代地位，增加值就高，而并不是绝对在两端。在所有的领域应该都是这样的，中国实际上应该利用我们现有的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加工体系，比较有竞争的、劳动力成本性能比高的优势，继续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我们劳动力比东南亚贵，但是比东南亚的劳动力素质以及加工提供服务能够迅速完成订单的能力超过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我们要继续保持这一优势，而不是动辄按照我们自己一方情愿的设想，试图改变产业链国际分工现状，用产业政策或者其他手段的来干预国际分工，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之下推动参与分工的企业向两端转移，这可能会破坏在比较优势之上形成的产业链，也达不到获取更大分工价值的目标。

俄乌冲突以及疫情封城对产业链的影响在与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风险变得不可控，成为一个产业链调整的原因。不是外资不愿意和你配套，而是配套所存在的政治地缘政治和国内外的各种突发因素导致出现了不可控的风险，不可控它就转移了。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要对待一个问题。产业

---

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很重要，也就是外循环，如果循环不畅，向外转移，我们马上就会面临着失业，面临着 GDP 数据下降。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等，它仅仅是从管理角度，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企业组织结构的视角。其实宏观层面我们仍然要强调的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带来效率的提升，促进比较优势的实现。要更多地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这样的一个大概念来解读产业链。当然，利益分配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国际分工本身受到威胁，利益受损会更加严重。

因此，我们的政策仍然聚焦进一步开放，进一步的释放你在参与全球产业链当中你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然后在价值上实现你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一定要素水平结构的条件之下，应该获得的你的收益，不要总是按照自己的最好的愿望去强调你的收益是被别人剥夺了，你是很亏的。你亏了，那就不参加产业链分工，就会有冲动构建自己的产业链。国际分工它很容易被替代的，除非你具有非常高度垄断的优势的创新，比如什么东西都是你发明的，你在创新上就有垄断，或者你有特殊的一种材料和

资源，只有你这个国家有，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必须要你和你配套。

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缺乏这样的垄断优势，那么就仍然应该强调要扩大我们国际分工，推动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此来制定我们的产业政策以及国际合作的政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中央其实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晰的。一再强调要构建制度性的开放体制，但是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地区，落实到底下，有的时候往往走形变形，导致效果不彰，我觉得现在效果要以效果为导向。

如果没有像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效果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之下，要想重新恢复内在的经济增长的活力会越来越难。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杨成：**谢谢徐老师，但是我想再追问您，刚才在发言里面特别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过去我们在讨论价值链产业链或者是这种都是往往是按照经济的角度去考量，所以它是以效率做一个优先的原则，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呈现这些安全，或者甚至是以政治正确这种作为一个背后统筹的依据。这种

---

情况之下，我们还怎么去应对这种已经明显发生的转向，比方说您也特别提到的西方现在越来越多的把我们捆绑成一个跟俄国一样的国家，而且这种认知是非常难改变的，它已经把它上升到一种制度竞争这个角度了，怎么去破这个局？

**徐明棋：**我就觉得我们就不能跟随西方的政治安全泛化的逻辑转，我们要强调国际合作给大家带来共同利益。但我们一些学者现在往往是讲共同利益的时候讲共同利益，但是回到很多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又以西方政治安全泛化逻辑，把政治安全、国家安全，把地缘政治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泛化，放到所有政策的首位考虑。那实际上是在帮西方反华势力来推动与中国的脱钩。

在现实过程当中，一些政策，很多具体的措施的推出，它有内在的逻辑上不自洽。我觉得在未来的对外开放以及我们好多产业政策的导向上，都应该有全面的考量。以中国现有的大市场以及我们产业门类相对比较齐全，配套能力比较强等等这一系列的优点，仍然还是可以继续维持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国际分工，进行经济合作。我觉得推进国际分工

和国际合作的主导思想还是应该确立起来，而不应该陷入西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陷阱。

**杨成**：非常感谢徐老师，最后我们有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乔依德副会长兼秘书长发言。

## **乔依德：美国西方对俄金融制裁对卢布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差不多三个月了，我们也封闭了两个多月，我们已经看到隧道有光了，但俄乌战争这个隧道的光还看不到。俄乌战争对全球的政治、经济、金融格局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今天我的发言是针对一个比较窄的话题进行讨论，主要讲美国西方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对卢布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我想先讲一下，美国西方对于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大概情况。首先是 SWIFT。俄罗斯全面攻入乌克兰是 2 月 24 号。2 月 26 号美国和西方国家就发表联合声明，将俄罗斯的 7 家银行踢出 SWIFT，最

近关于 SWIFT 的文章很多，我也不详细讲了。主要的一点是，SWIFT 是一个报文发送体系，广义上它是全球支付清算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不做清算，不是说没有它就不能做生意了，但是代价会更高。第二是外汇储备。美国西方冻结了俄罗斯约 3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俄罗斯现在约 6400 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概一半。第三，美国西方不允许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币等西方国家的货币进行交易，美国把俄罗斯的一些银行放入它的 SDN 名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 List），这些银行不仅不能用这些货币，也不能与美国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24 号开打，26 号这么快就这样制裁？实际上根据现在外媒的透露，西方国家预先也做好预案了。因为在这以前，拜登和美国政府好几次说俄罗斯要打乌克兰，俄罗斯方面一直否定，说没有这个事，但是西方私下是做了预案的。有一个细节比较有意思，对于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其实美国财长耶伦当初是犹豫的，欧洲国家很着急，最后请了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他以前是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而且

跟耶伦关系很好，让德拉吉打电话给耶伦，最后推出了这个制裁。这两天刚好有一个报道，耶伦心里本来憋着的话，最后还是讲出来了，她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扣押外汇储备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过她也说，重建乌克兰需要很多资金，我们会要求俄罗斯拿出钱来。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法有很多说法，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美国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目的，第一是当然打压卢布，第二是切断俄罗斯与外界的经济、金融联系，最好是拖垮俄罗斯的经济。3月26号，拜登在访问波兰的时候说：卢布即将沦为瓦砾。卢布的英文 rouble，瓦砾的英文是 rubble，他算是讲了一个俏皮话吧。不过现实是卢布并没有被打垮。下面我就比较详细地说一下金融制裁对于卢布到底有什么影响。

卢布发生波动，开始先下跌，卢布兑美元的比价在打仗的第一天是 83.2: 1。3月10号跌到最低点 150: 1，差不多跌了一半。然后就反弹，目前已经收复失地，而且比战争爆发前还有上涨，5月16

---

号是 64.2: 1，卢布的汇率不仅恢复，甚至比原来还要强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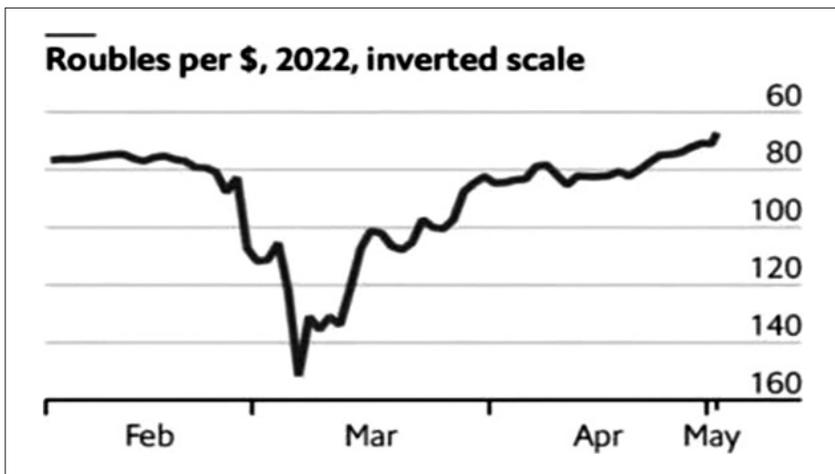


图 1：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波动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为什么它能够收复失地？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俄罗斯已经有一些准备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俄罗斯就大量减少美元资产，增加黄金。可能它对欧元估计不足，以为欧洲不会加入制裁，实际上欧洲国家也制裁了俄罗斯，这个它没有想到。图 2 显示，俄罗斯外汇储备中，黄金和欧元的比重较大，美元的比重较少。

第二个原因，俄罗斯的经济来源未被切断。它

主要的生命线或收入来源，现在还没有被切断。从图 3 可以看到呢，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例较大，占了 44.3%。同时，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是比较大的，46% 的煤炭，41% 的天然气，27% 的石油，依赖于俄罗斯的进口。现在美国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了。欧盟这两天还在博弈，因为有些国家，如匈牙利就不赞成。所以整体上，欧盟还没有对俄罗斯的石油或天然气进口采取措施，这使得卢布能够得到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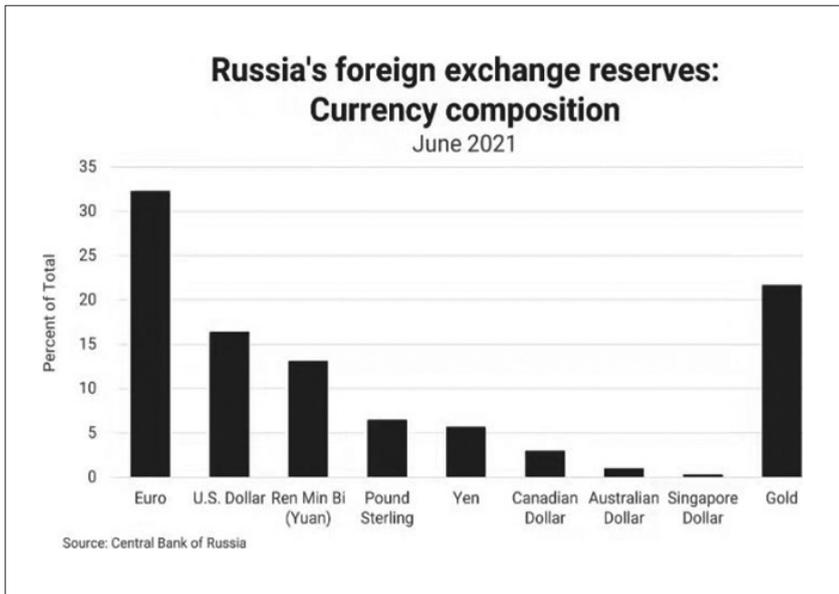


图 2：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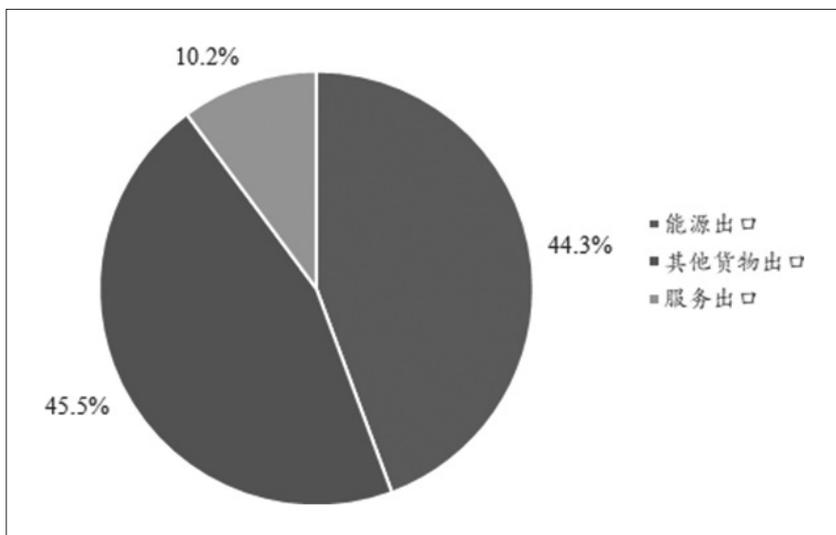


图 3：俄罗斯出口构成

第三个原因，俄罗斯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措施，这些措施看来比较恰当。首先，它大幅增加基准利率，制裁两天之后的 2 月 28 号，把基准利率从 9.5% 一下子涨了一倍，达到 20%。当然现在卢布稳定了，它又降到 14%。其次，实施资本管制，2 月 28 号开始限制居民提取外币的额度，不允许外国客户出售俄罗斯证券，也禁止居民携带 1 万美元以上的外汇出境。再次，3 月 23 号，要求所谓不友好国家要用卢布购买天然气。最后，卢布绑定黄金，这和要求卢布购买天然气是结合在一起的。它

把一克黄金定价为 5000 卢布，但是市场上是 6000 卢布，逼得其他国家如果要用卢布支付的话就要出售黄金。这样就支撑了卢布，使得卢布反弹。

下面我讲一下卢布今后的变化趋势。今后发展趋势的主要决定因素，一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二是美国欧洲的制裁程度。如果战争结束的早，就不会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受的压力就会减少。短期来看，卢布还是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是它的国际收支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宗商品、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它第一季度的国际收支反而增加了 80%，所以短期来看卢布是能够保持稳定的。中期来看，它还是受到很大压力的，因为在一年或一年半以内，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可能会大大减少，甚至完全和俄罗斯脱钩。这样一来，卢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坚挺。长期来说，卢布很可能下跌，因为经济制裁会切断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它的科技不能得到发展，会影响它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知道，看汇率，短期看需求、进出口，中期看经济结构，长期看劳动生产率。

下面我想对俄罗斯使用卢布结算做一点评估。

---

卢布结算未必会扩大到其他商品。俄罗斯要求不友好国家用卢布来购买天然气，俄方有些高层人士表示这种做法可以扩大到石油，扩大到木材，扩大到粮食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未必很大。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如果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司不愿意用卢布结算，就会影响俄罗斯的就就业。俄罗斯需要维持生产，维持就业，哪怕收的是外汇，还是有好处的。俄罗斯希望其他国家用卢布来购买，除了支撑卢布以外，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因为西方国家不允许俄国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所以害怕拿了其他货币没法使用。但是实际上这个还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要归还外债。

2021年俄罗斯的外债大约是4800亿美元，币种主要是美元和欧元，加起来占了63.1%。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博弈，最开始俄罗斯还外债，西方先是同意俄罗斯用被冻结的外汇储备来还，后来想不对，不能用外汇储备，要俄罗斯用自己国内的外汇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俄罗斯提出要用卢布，西方也不同意。这样造成什么局面呢？俄罗斯可能要违约。俄罗斯或苏联从1918年以后，外债从来没有

违约过。一旦违约，以后你再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就会比较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博弈，最后俄罗斯让步了，4月29号俄罗斯财政部对于2022年的欧元债券支付了5.6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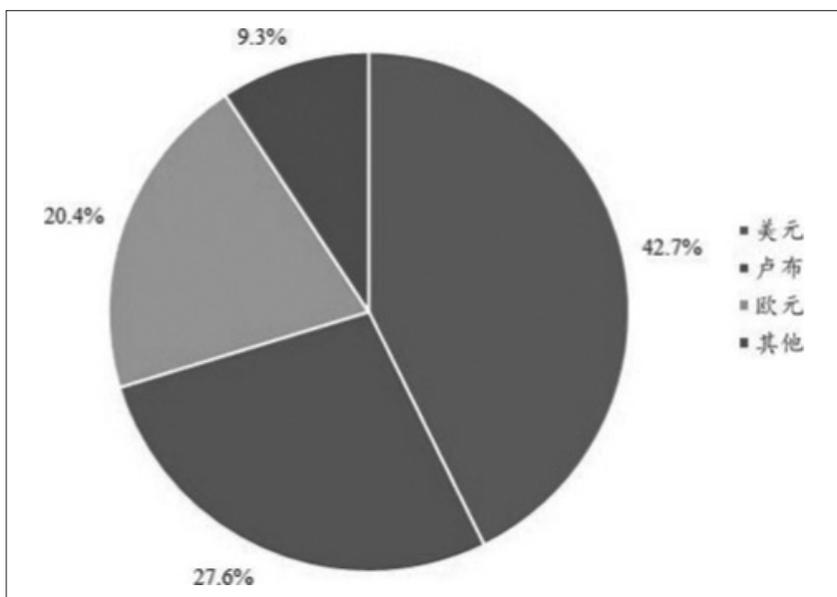


图 4：俄罗斯外债各币种构成比例

另外，俄罗斯用卢布结算的方式很难再去扩大，其影响是有限的。我们国内有一些言论，说现在用卢布来结算，是“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以实物货币为准备的货币再生”。下面我想讲这样一件事对全球货币体系到底有什么影响。

现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实质或主要特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它是信用货币时代；第二，它是美元占主导地位。最近有人提出，现在可能会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III，瑞信的 Zoltan Pozar 写了好几篇文章，鼓吹以后要以大宗商品为本位。他说：“你可以印钱，但是不能印石油和小麦。”这个话听上去有道理，但是实际上是错的。你有石油和小麦，但怎么和其他东西交换？还是要通过货币这样一个媒介来做，你不能回到以物易物的方式，那是很低效的。他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大宗商品储备的需求就会上升，就会替代外汇储备的需求。但是，外汇储备有它的特点，它必须有安全性，还要容易变现。如果把大宗商品作为外汇储备，其价格波动是非常大的，也不是很容易变现。现在想回到商品或黄金为基础，这是倒退。

货币体系的发展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货币本身就是商品，比如毛皮、贝壳等，本身是有价值的。然后到第二阶段，叫本位货币下的货币，这个货币本位就是锚，这个锚可以是黄金，也可以是

纸币。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1 年垮台以后，货币是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全世界现在都是这样，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信用货币也有它的缺点，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信用货币。

关于美元的地位，大家谈的很多。美国把美元武器化，有负面的影响。还有一个是违约，人家用美元做外汇储备，你把人家的外汇储备扣下来，就是违约，是有后果的，影响了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尽管如此，我觉得短期内美元的主导地位还是不会改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 5，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从几年以前的 70%，降到 2021 年年末的 58.8%。但是美国除了储备比例下降以外，其他所有指标都是上升的。最近 IMF 调整了 SDR 篮子货币的构成权重，人民币的权重增加了，增加了 1.36 个百分点，但是美元权重增加了 1.65 个百分点，增加的比我们多。美元的主导地位在短期不会改变，但是长远来说，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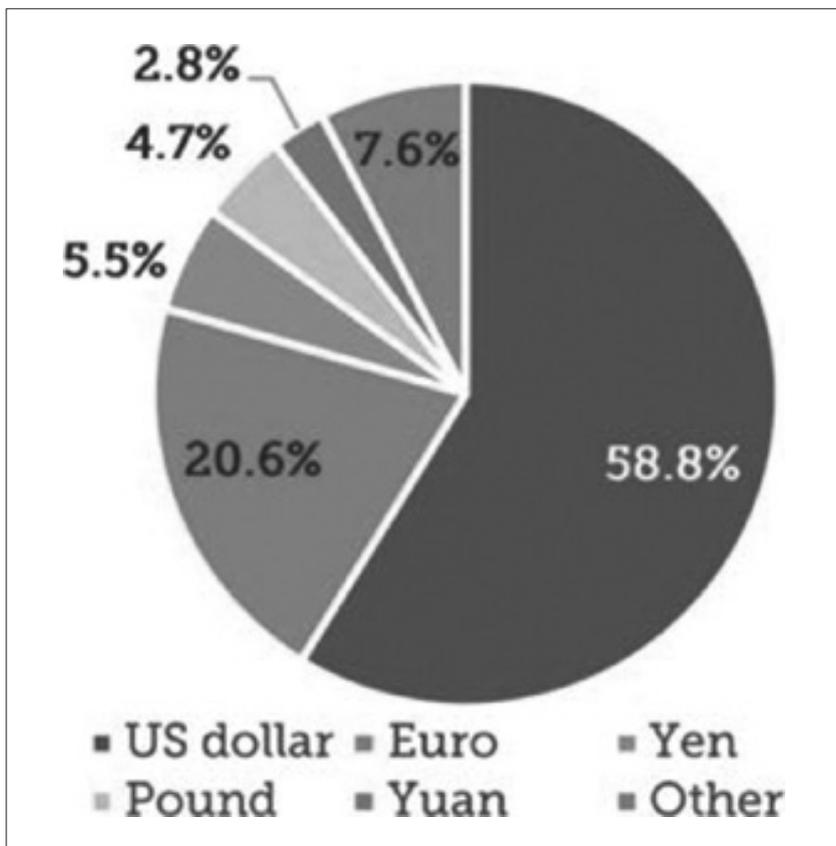


图 5：2021 年第四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比例

最后我讲一下，从结构的角度来说，货币体系的根本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托马斯·科恩有一本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他提出，体系内部结构性的变化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是“范式”转换。我借用这个概念，

来看货币体系是否达到了范式转变。货币体系的所有范式转变，都是由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来推动的。比如说金本位的崩溃，是由于上世纪 30 年代爆发大萧条，英国、德国先后取消了金本位。然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这个重大事件，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实际的货币体系被打乱。信用货币时代的开启，是由于尼克松在 1971 年 8 月 15 号发表谈话，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但是我看现在，俄乌战争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门槛，因为俄罗斯占全球 GDP 的比重只有 1.9%，其大宗商品出口虽然占全球比例较高，但是商品和贸易的比重还是较低。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美元的地位，还是信用货币的基础，目前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最后我说三句结束语。第一，最近发生的大规模金融制裁，对俄罗斯的冲击还是比较巨大的，但是俄罗斯还是有博弈的空间，还是有反制的手段。第二，金融制裁对全球金融货币体系，虽然有影响，但要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为时尚早。第三，俄乌战争对全球政治格局，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明显和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以后怎么影响到国际

---

货币体系，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杨成：**谢谢乔依德老师，您在发言里有很多点非常精彩，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是批评了以大宗商品为本位的想法。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布雷顿森林 III 这个时候该出现了，那么您设想一下，中国在这里面可以提出怎样的建议，按照什么规则或按什么本位来进行，能够既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也能够应对当下的整个国际经济，甚至能够让整个世界经济更加稳定？

**乔依德：**首先，我不认同布雷顿森林 III 这个提法，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是信用货币时代，没有看到有什么新的东西来替代。尽管 10 年前比特币出来时很多人欢欣鼓舞，但是现在看来，比特币、稳定币都不能代替现在的信用货币。尽管信用货币是国家以强力来发行的，肯定是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现在没有看到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前两天数字货币跌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数字货币替代不了信用货币。就像以前用毛皮作为货币，后来用金子，这当然是一个飞跃，但只是一个材质上的改进。

现在美元独大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从长期来说，也不能持续。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美国的 GDP 现在占全球的 24%，但是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比例大大超过 24%，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效应。美国的 GDP 以后在全球比例还会继续下降，中国 GDP 的比例还会继续上升，所以比较长一段时间以后，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演变很有可能一个结局。

对于货币，有很多误解，有的说现在人民币是以美元为锚，或者人民币发行是以税收为支撑，这些都是错的。政府想发就发，全世界都是这样，实际上是经济增长需要多少就发多少。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大家拿钱是可以交换实际东西的，所以总觉得货币后面有什么实际东西在支撑。但是你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情。当然说来话长，真正发货币的不完全是央行，央行只是发基础货币，大部分货币都是商业银行通过实体经济需要贷款发出去的。这样一个结构，现在看不到有明显的改变。有一点我们心里一定要有数，货币跟实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我在好多场合讲过，它是有

---

弹性的，像橡皮筋是可以拉一点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美国得到很多好处，但是这个好处不是无限的，橡皮筋拉得太长就会断掉，或者是高通货膨胀，或者是经济衰退。发货币有没有一个公式？没有。很多人设想了很多公式，但这个是不存在的。我现在想到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欧元能够巩固下来，很有可能再过 20 年，或者能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能不能达成还有很多因素，我就讲这些。

**杨成：**我作为主持人时间控制得不好，已经大大的超时了。我们今天这个会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参会的各位老师，特别是我们的发言嘉宾，感谢你们的贡献，谢谢。



## 如何看待当前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

-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陈琦伟 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  
罗长远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郑 艺 上海美国商会总裁  
黄 峰 外商投资协会会长  
吴永新 西门子中国执行副总裁

系列座谈会第 70 期 2022 年 6 月 1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 6 月 1 号，是上海复工后的第一天，我们开这个研讨会，时间也很巧合。网上也有段子，说这次封城，开始于愚人节，结束于儿童节。其实儿童节也不错，我们每个人都从儿童开始成长的。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应对当前中外企业向外迁移这样一个现象。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六位在这方面有研究的，或者有

深刻体会的专家。最近这几年，大家都比较关注部分中外企业的外迁，其背后的原因，大致上一个是由于经济规律，客观造成的产业转移；另外这几年，地缘政治恶化也可能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还有就是这次疫情的冲击，可能是多种情况雪上加霜。不管怎么样，我们还需要认真分析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这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下面我们首先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先生发言。我们每个人发言大概 15 到 20 分钟，最后我们再留半个小时给大家提问。

## **徐奇渊：全球产业链重塑趋势背景下的 在华企业外移观察**

**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团队最近出了一本书《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我就结合今天的主题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刚刚乔老师也讲到，我们现在面临在华企业，包括中外企业的外迁外移，外移有很多原因，

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

外迁大体上分成几个阶段，不一定很准确、是一个大致的划分：

第一轮是 2013 年到 2015 年，因为纯经济的一些原因，比如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到了一个高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民工荒、用工难这些问题，包括资金成本也比较高，房地产价格、用地成本在上升。

第二轮是 2016 年到 2018 年，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特别是去产能的背景下，一些过载产能，包括有环保压力的部分产能转出去了。甚至有一些稀土的加工处理都转移到邻国，所以我们还要进口一部分稀土。

2018 年开始了第三轮，包括彭佩奥、班农这些政客主张和中国全面脱钩，鼓励美国企业回流，因此出台了很多政策。

第四轮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他们部分继续、部分反思了特朗普的政策。在去年 10 月份的演讲会上，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提出和中国再挂钩（recouple）的同时美国要对中美经贸关系占有主导

---

权，这和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政策是一致的。具体地，会表现为在中短期、在传统领域和中国再挂钩，而在中长期、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要和中国保持距离、甚至孤立中国。最近欧美的贸易技术委员（TTC）再次发表声明，对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标准提出了一些共识。耶伦最近也提出来“友岸外包”。因为尝试产业链回流到美国的努力没有成功，就希望传统的产业链能够掌握在与它政治关系比较稳定的印度、越南这些国家手里。现在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总体上经历了这样的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经济因素为主，后两个阶段以政治因素为主。下面我们看看企业的行为变化。

以某国商会的情况为例，他们做了一个调查。从2015年到2020年，该国外资企业撤出比例一直都很低、不超过2%，高峰主要在2015年、2016年那段时间，后面是逐渐下降的。当然这里有幸存者偏差，想迁的早就迁走了，不想迁走的，剩下来都是铁杆，都是相对状况比较好的。总体来说，迁出的状况在2015-2016年其实更加严重。到2019

年和 2020 年，中美贸易战打起来以后反而流出比较少。不过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外资企业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就是维持观望、维持现状的比例明显上升，而扩大生产的意愿明显减少，出现了收缩。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第四轮外迁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像乔老师刚才开头讲到的，有经济因素，有非经济因素，那么经济因素，比如竞争中性的、ESG，特别是绿色低碳等等。非经济中性，包括国家安全边界泛化、民主人权、友岸外包这些因素。我想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适应能力很强，因为中国总是在变，唯一没有变的，就是一一直在变。所以呢，如果仅仅是经济因素的竞争，我想中国企业是可以承受的。但是非经济因素的竞争，对中国来说就格外有一些压力。

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看看绿色产业，这些年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在绿色这个领域，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太阳能组件、多晶硅、风能、电动力等领域，中国在全球的产能比例都是很大的。哈佛大学三月份的一篇报告揭示了这些数据。

---

我们其实也整理了一组数据，甚至比他们还要乐观，比如说电动车这个行业，他们的报告中占比是40%多，但是我们中国的乘用车联合会的数据，在全世界的生产份额当中，新能源车占到53%的比例，纯电动车占比超过60%。像太阳能组件产能份额是75%以上。所以各个方面，在绿色这个领域，中国都是很有竞争力，这个和我们的政策有关系，也和我们企业家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对新技术的追求，很有关系。所以这个是想说明，如果只是看纯经济竞争的话，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不能又搞成新一轮产能过剩，把国际竞争对手都逼到墙角里去，而是要实现共赢。另外也要看到，在新能源产业链上中国企业仍然处于中端、低端更多，在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还需要继续努力。

纯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会自然发生一些产业外移。从某国商会的调查来看，这个国家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布局中，对低端产能的扩张比例是最低的，远远低于越南、印度。但是在高附加值产能方面，在中国的扩张比例则是相对较高，明显高于越南、特别是远远高于印

度。另外还可以看到，出于当地销售功能定位的扩张比例，印度最高、中国其次、越南最低。销售功能方面，为什么在印度扩张产能更多呢？因为印度是一个进口替代型政策，进口关税非常高，这样大家都希望在它本土进行销售。

从上面可以看到，国内市场规模、体量对于吸引外资很重要。另外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对于吸引低附加值外资的吸引力确实明显下降，不如印度、越南了。不过中国在高附加值投资方面仍然是有较强吸引力的。

	传统贸易一体化	生产一体化 和全球价值链扩展	信息全球化 军民两用技术、安全边界模糊
什么跨境?	消费 (贸易)	生产 (投资)	信息 (安全)
表现形式	关税冲突	市场准入、知识产权 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等	技术冲突
冲突触发点	《特别301报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2018年5月		《中国技术转让战略》 美国国防部, 2018年1月
协商路线图	易	→ 较难	→ 难

全球治理显著落后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回调

图 1: 全球化的三个阶段 vs 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

非经济的竞争因素，我想重点讲一下国家安全边界的模糊。这就涉及到全球化三个阶段的背景。

第一个阶段是跨境商品流动，第二阶段是跨境资本流动。到第三个阶段是跨境信息流动。特别是 2010 年以来，因为移动终端、手机互联网发展非常快，所以这个时候，跨境信息流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新的全球化体现为跨境信息的流动。

这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国家安全边界和以前不一样了。而这在前面两个全球化的时代是很清楚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要出口飞机的机身材料，T-300 强度还是 T-800 强度的？技术标准的区别非常明确：T-300 用于民用航空，T-800 用于军用，美国使用不同管制手段进行审查，300 是民用、不要审批就可以卖，但是 800，每年只能卖多少，而且你要申请什么用途，要证明等等。这样从他的角度国家安全边界是完全可以区分的。

但是信息的跨境流动和商品流动不一样。信息流动包括每个人的信息、每台终端的信息，这些海量数据汇总以后，这个信息可以是民用的，也可能会形成军用的可能性、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安全。这不仅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在考虑的风险。所以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军民两用技术

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而且国家安全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搞不清楚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像 WTO 的问题解决机制，主要针对的是第一阶段的全球化，也就是针对跨境商品流动时期出现的关税冲突。当然，WTO 也能解决一部分第二阶段全球化的问题，也就是和贸易相关的投资、和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但是对于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等更多的问题，WTO 的功能也比较弱。特别是进入到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跨境信息流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时候 WTO 更加没有影响力了。所以我们现在急迫的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治理——它的发展显著落后于我们全球化本身的进展，这有些类似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问题。所以全球化出现了回潮。

在这个背景下，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在一起，国家安全边界的模糊问题对他们的冲击较小，但是对于中美这样的国家关系冲击会比较大。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些新兴科技行业面临一定的脱钩风险。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产业链外移的动力进一步上升。

上面讲的都是产业链外移的动力。下面我们讲一下产业链外迁的阻力是什么，当然这个阻力对中国是有好处的。首先我们给“外移”一个界定，它是中性的，不是说外移就一定是坏的，当然外移坏的结果是导致产业的过度更新化，好的结果是它合理的外移，是产业链自然升级的一个过程，有助于形成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我们以前经常讲苹果手机的价值链，是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生产。在这个情况下，最后富士康增加值比较低。一台苹果手机，美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那我们现在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善。我也注意到，像珠三角长三角很多企业，比如说做服装的，以前是代工、贴牌，利润很低，现在请了葡萄牙的设计师，自己搞设计、利润高起来了，他就把生产环节外包了。还有一家企业生产LED灯，以前也是利润很低，现在不生产了、只做研发设计，利润也上升了。而且这样污染还更少。所以中国正在朝这个上游去走，附加值更高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合意的，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

下面看看在华外资企业外移的阻力，第一个是

外资企业外移的机会成本比较高。从某国商会的数据来看，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是最高的，如果让它突然迁移到东盟，就意味着投资收益率每年要减少6个百分点，这还没有算它一次性的产业迁移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如果让它迁移到北美、欧洲地区，那就意味着，每一年的投资收益率要下降9个百分点，这个成本也是非常突出的。但是，还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企业在全世界布局的时候，在中国的投资分布比重是比较低的，只有9%，还不如一些中小型经济体的比重。为什么会这样？中国投资收益率这么高，但是只投了9%，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时候，会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会受到民间情绪的影响。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投资，虽然投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有政治上的互信，有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如果你真正想留住外资企业，包括继续享受外资企业这些正面的技术管理方面的溢出效应，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

位，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

所以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仍然非常有吸引力，如果非要让它搬到国外去，确实是万不得已，或者是一些非经济的原因，实在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才会搬走。但是我们也不能挥霍外资企业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性，有时候非经济因素也会非常重要。俄乌危机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跨国企业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资产都不要了，就是要离开俄罗斯，所以有时候企业也不是只看经济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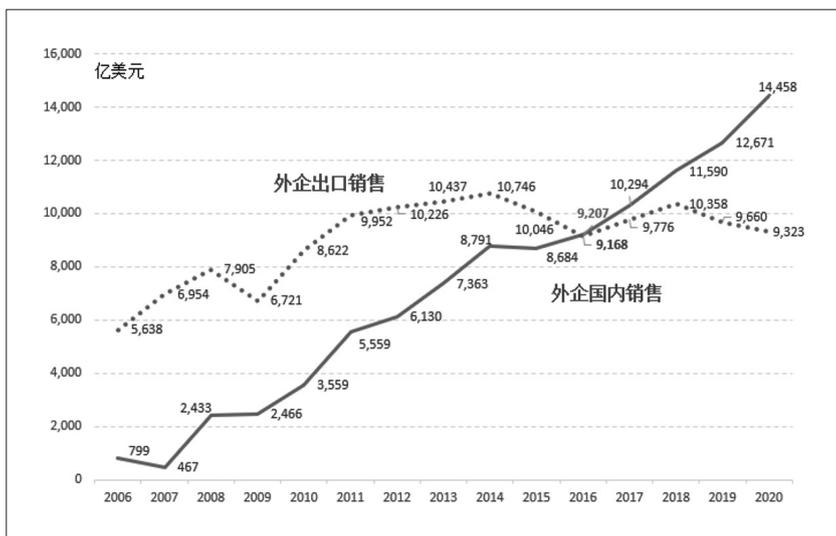


图 2：外资企业的内销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出口外销

第二，对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也就是市场规模也在上升。在华外资企业有两项业务，一个是外销出口，一个是内销。我们看到 2006 年的时候，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只有 800 亿美元不到一点，而出口的金额有 5600 亿，出口是内销的 7 倍。到了 2016 年持平，到了 2020 年，外资企业的内销已经达到 1.4 万亿美元，出口只有 9 千亿美元，所以 IN CHINA FOR CHINA 这样的战略已经确立，这个时候，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它影响的只是出口一部分。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国内的销售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市场，我们讲扩大内需，发挥我们大市场，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就体现在这个方面。这也是国内大循环的切入点，外资企业业务本身也更加看重国内销售。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越南，看看越南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中越经贸关系是什么样的定位。我们会看到，中国和越南出口的互补关系远远大于中印、中墨。中越出口的互补性是相当强的。在过去 20 年当中，中国对越南出口大幅上升。2000 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只有 8 亿美元，到了 2021 年中国对越南出口已经超过 1200 亿，大幅度上升。

越南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美日韩。越南这样一个不大的经济体，经济体量是比广西还略小一些，这样一个经济体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目的地，这也体现出中越之间的互补性关系，所以我们对它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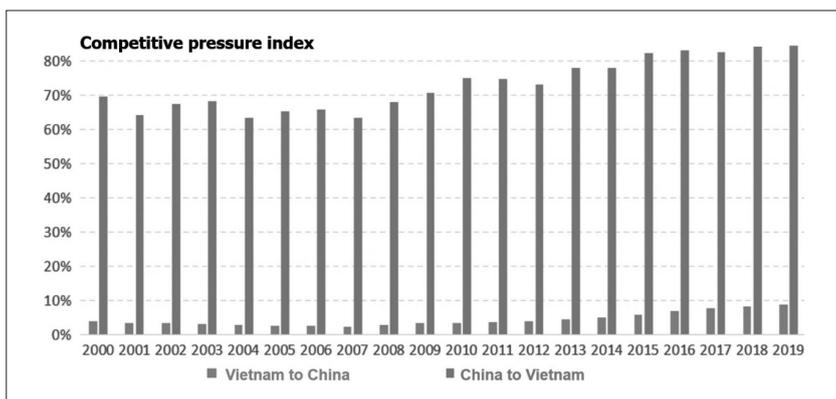


图 3：中国出口和越南出口竞争指数

再看中越出口贸易的竞争指数，这个竞争指数在 2019 年的时候，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 0.85，越南对中国的竞争压力是 0.093，什么意思呢？越南出口 100 块钱当中，和中国出口完全相同的竞争关系的产品，有 85 块钱，或者说越南出口 100 块，中国就有 85 块钱跟它重叠的有竞争关系。而中国出口 100 块钱，越南只出口相同的 9.3%，只有 9

块 3 毛钱跟中国是重叠的。所以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是主导性的，绝对压倒性的优势。而越南对中国竞争压力比较可控，虽然也上升得很快，但是相当可控。所以总体上，我们认为中越经贸关系是互补关系为主，而且竞争关系方面，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

最后我做一个结束语。外力是压不垮中国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就像 2018 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打压中国、加征关税，但是中国的出口从 2018 年到现在，每一年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都在稳健上升。包括打压华为这样的一些科技企业。但是，华为的营收能力、利润情况都是相当好的，去年华为的盈利同比增长 75%，剔除掉出售荣耀的因素以后，利润增幅还是百分之大几十。总体上我们看到，中国企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变化和困难，都是有能力应对的。当然今年初以来我们碰到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避免自己把自己的增长空间压缩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乔依德：**谢谢徐奇渊。徐奇渊自己出了一个很

好的报告，他今天的发言可能是这个报告中的一部分。他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看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哪些企业出去，动力是什么，阻力是什么。他的发言高屋建瓴、比较全面。我提一个问题，你对最近美国搞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有什么看法？

**徐奇渊：**总体上，美国退出 TPP 以后，无法再回到 CPTPP，因为国内民意不支持。所以，美国选择印太框架这样一个体系，作为重返亚太的一个具体安排，包括经济、地缘政治方面。但是它并不像 CPDPP 或 RCEP 有一揽子系统的贸易或投资协定，而是相对来说比较松散，所以它具体能发挥多大作用还要再看。

**乔依德：**谢谢奇渊。下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陈琦伟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逻辑和对策”。下面我们欢迎陈琦伟发言。

## **陈琦伟：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逻辑和对策**

**陈琦伟（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我抓紧时间

切入正题。我现在人在美国加州，我是前周来的美国，上个礼拜在硅谷八天，见了一批朋友。在南加州大学 USC 商学院，也包括当地商会，做了一些聚餐。在信息上，比我出来之前想象的更加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句话我想讲什么呢，2022 年这一年，变化之大我们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很多变化出乎意料。比如说，美国学界商界对中国的看法超过我的想象，我原来还想，中国话题总还是重心，但是跟他们谈了以后，边缘化程度超过想象。我在上海期间和企业界、投资界接触比较多，包括各大商会都有沟通，所以也知道一些他们的想法。我感受得到，哪怕没有出来之前，欧洲商会，日本商会、美国商会等等，他们已经有一些快速变化的想法，不是在稳定状态之中，这个很重要。2022 年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变，在加速变。我们现在的主流思维方式对它的变化，只可能低估，不会高估。因为 2022 年所有大的因素，都不处于稳定状态，这个非常重要。过了今年以后，我们回过头看，大家会体会非常深，今年外部环境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稳定的因

---

素，现在6月1号了，上半年快过去了，全年没有结束，还会不会有更大的变化发生呢，也很难说。

因此，开这个会，非常有意义的是问题的切入点非常是焦点，它后面是一个大背景，即这十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一定程度的困难，中国经济经过20来年的高速成长，困难在十来年之前就开始出现，结构性的问题，各式各样调整的需要，但一直拖延下来了，到了今年就不是在一个线性的轨道上，今年是发生一些转折点的因素。今年我们观察分析问题，都要特别注意，不然的话，很多结论会出错。

我讲三部分，第一是讲全球产业链重组是大势所趋。

前周，我们自己召开的亚商资本策略会请了三个嘉宾，一个是黄奇帆，一个是TCL的李东生，还有蔡洪平，他原先是德意志银行亚太区的主席，现在是汉德工业基金会的主席，他已经回到欧洲，是连线进来的。还有另外其他几个大企业家。那次开会讨论了产业链脱钩的问题，外移的问题。大家讨论，作为应对策略采取的一些措施，是有可能去对付的呢，还是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东西？今天

我想简单讲讲那次会议以后的结论。关于产业链的外移好，重组也好，包括今天讲的撤资也好，不是我们都应对得了的，是有我们能力之外的东西的。这一点，从务实的做事情来说，非常重要，要讲清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我们自信太过头，以为什么事情都应对得了，那么事实证明，我们现在一路过来，其实很多事情是有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

远的到中美关系，2018年4月份，我在钓鱼台参加中国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发言，2018年春天，那时正好是鹤总到美国谈判贸易战，和特朗普谈判回来，在两会上介绍了一下。当时的基调很清楚，在钓鱼台论坛上，一些专家都引用了鹤总的讲话，说中国2018年往前看，前途一片光明，没什么事了，中美贸易战打不起来，无非就是花点钱买它点东西。特朗普是商人，他就是要点利益，是吧？在他的选票州，多买点东西，这个事情肯定搞定，一片乐观气氛。我在论坛发言，说中美贸易战可能意味着中美经济大关系的一个转折的开始。中美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一年两次，结果到了秋天开会的时候，

就点名邀请我再来讲一讲，因为春天时只有我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是一个转折的开始。这也是我们一直低估国际环境变化的一个例子。

近的到这次上海的抗疫，其实也是低估了困难，总攻攻了两个多月，这个不在我们题目之内。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对策，要看到有我们能力之外的因素。

哪些因素是我们能力之外的呢？一个就是国际大格局。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秩序大格局的调整，原来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体系）、联合国为三大支柱，支持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现在它本身差不多走到头了。不只是因为中国这么强大的快速崛起，中国的竞争力主要在中低端产品的供应力，但主要是冲乱了发达国家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失业率提高，这不是中国的错，这完全是基于市场的经济分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情，它是一个双刃剑，它使得全球经济总量、财富总量增长，财富水平提高的同时造成了不平等，市场的趋势会造成不平等。再加上西方政府都是任期制的，他们要取悦选

民，其实这个趋势在前 10 来年也已经开始了。全球的经济格局都已经有一个调整的必要。但选举是有利益驱动的，为了很实际的选票利益，很多事情拖延下来，以至摩擦加多，矛盾一点点深化了。所以这个调整是大势所趋，我们扭转不了，这是非常根本的因素。因为这个大因素，我对产业链外移不那么乐观，它有一个大背景在。我们也一直批评西方国家趋向于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确实是有这个，而且这个势头现在根本没有看到扭转的样子，只不过现在做法上有不同，这是一大因素。

第二大因素，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当选政府的意愿。现在各国的当选政府，大部分愿意把问题甩锅给别人，这也是事实。这个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其实也多次出现过。有矛盾了，就甩锅，甩锅了以后再谈判。

第三个因素，是谈判的问题。长话短说，现在谈判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并不是所有参与者一起坐下来商量。一开始特朗普和中国打，他也给欧洲压力，打的也很凶，所以欧洲原来也不听它的。中国做了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中欧投资协定，

这么有利这么重要的一项措施，欧洲国家还是讲法制的，如果那个协定签了，如果能够过了，是中国之福啊。但因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最后中欧投资协定被取消了。那时候欧盟和美国还是有明显矛盾的。但是打到现在，打着打着大家都看清楚了，普京这个猪队友助了一把力，把西欧往美国那边推。

从国家利益来讲，我最钦佩邓小平先生，韬光养晦，忍一口气嘛。因为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第二，等到第一的时候你再牛。当然，邓小平的意思是，第一也不牛。但是新一代不一样了，比如年轻人 90 后，觉得我该牛就牛，那也等到第一再牛啊。现在美国和西欧在打架过程中，拉着日本、东南亚搞印太经济框架，原来没有规划到这个程度，现在就非常有效率、非常动态地浮现出来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我们中国原来有很好的策略，发生任何矛盾，咱们一对一地谈。菲律宾跟我们有矛盾，别人不要插手，我们跟菲律宾谈。马来西亚，我跟你一对一地谈，印尼一对一地谈，德国一对一地谈。但是现在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他们开始以意识形态划线，这个因素千万不可忽视，2022

年最明显的特点是这个旗帜高高举起。咱们中国是对的，咱们不举这个旗帜，咱们也没有办法举。但是西方把这个旗帜高高举起来，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因素，使得产业链重组的大背景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因素。

最后讲一个，我们国家这几年的调整其实很不容易，应对外部的压力，内部调整的需要，经济形势现在很不好。咱们中国内部真的应该踏踏实实做企业家的意愿、信心、策略的统计，做出来以后对国家的决策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我了解到的长三角民营企业，大部分不打算做任何扩大投资。他们这些企业家，因为是有产阶级，最希望社会稳定，自己能赚钱，为国家做贡献。他们现在都非常迷惑，都说，第一，肯定不扩大了，不可能再做新的事情了；第二，就是关心财产的安全问题，这是很普遍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这个咱们回答不了。我觉得从国家管理角度、社会管理角度，要重视，要了解情况。这些因素就助力产业链的外移。我下个礼拜去墨西哥，会见到很高层的人。中国的头部企业在探索到墨西哥

投资，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个不是在统计数据里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从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过去的。

中国的优势，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了，像供应链、我们的大市场、利益导向等等。我讲讲我们不利的地方，值得认真看待。第一，我们的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可预测性，这个至关重要。这是大家产生困惑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揣摩猜测、小道消息成了主流，这对一个大国的稳定投资环境是不利的。第二，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是一个强政府，但是政府的干预也要体现出程序和法制，这个特点要体现在政府的管理上。第三，我要特别讲讲文化的因素。现在咱们分析中国和外国优势劣势，中国的意识形态现在为什么在国际上没有办法讲呢？因为中国人实际展示的价值观就是认为钱能搞定一切，这是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是要钱，但是西方是有价值观，有文化的。最简单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基督教，基督教的特点是什么？它是有是非观的，是非是很分明的，这个不展开了。在文化的应对上，咱们应该来

想，中国在价值观上怎么能够和西方有所平衡，真正能对抗。

最后我讲讲我们的应变策略。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勤劳智慧的一个群体，他们自己已经在想应对策略了。几个方向都是对的，第一个是提高附加值，增加科技含量，引入新科技，进入大数据时代。第二是刚才讲的，在布局上实际上企业家已经做在前面了，不要你政府号召。因为美国现在向其他国家开放，中国企业如果在那里生产，就用那个地方的份额进美国市场，是完全可以得益的，这个情况后面会看到的，这个值得鼓励。第三是企业逐渐要变成创新主体，这一点上政府应该去帮助企业，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走。

从政府层面来说，在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时，现在政府的管理就是自上往下层层压责任，这必然影响效率，这是这几年一个突出的现象。中国政府这几年的效率是不是提高了？总书记一拍板，那就好办，但是总书记能为所有事情拍板吗？在实际过程中，各地政府的效率是降低的。所以这个问题要解决。

对于解决外企困扰的问题，我个人有个建议。建议上海市政府学习当年朱镕基做市长时的做法，成立外资招商的一个办公室，不要市长热线。这次你看上海疫情，12345 都打不通的。现在中国习惯了，上级在哪里，你自己找去。这是很不好的，很要不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八股，这几年都是有所增长，而不是减弱。所以我觉得，上海市政府如果成立一个一站式解决外资困扰问题的办公室，务实地帮助外资企业，不失为一个应急的办法，会很有助于提高效率。

**乔依德：**谢谢陈琦伟。他一直在一线跟中国企业打交道很多，他强调我们不要低估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谢谢。下面一位发言者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罗长远先生。

## **罗长远：供应链重组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

**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就是怎么去看供应链重组背景下的国际资本流动。我的汇报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有关外资利用的几个问题，第二是有关全球化发展的几个趋势，第三是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几点研判。

首先，有关外资利用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无实现良性互动？从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外资进入的速度在放缓，但是“走出去”的速度在加快，这与二者良性互动的预期存在很大的距离。我们在的一个研究里发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良性互动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呢？因为“引进来”和“走出去”都需要资源，如果把更多的资源配置给了“走出去”，那么“引进来”就会受到拖累。2018年以来，由于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的影响，“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双受到拖累，都有所回落。

第二个问题，高标准对外开放有没有促进来自美欧日的外资利用？在整个中国的外资利用里面，来自美欧日的资本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并且呈走低的趋势。我们都知道，做自贸区，还有跟欧洲的 CAI 谈判，包括奥巴马时代与美国的 BIT 谈判，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强调对接全球最高的投资和贸

易规则，但是从数据上来看，这方面的成效还没有呈现出来。

第三个问题，外资准入门槛的不断下降有没有实现外资利用的多元化？从数据上看，来自中国香港的资本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现在大概有超过70%的资本是来自于中国香港，离外资多元化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四个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有没有导致外资利用过度或者过早的“去工业化”？截至2020年，外资流向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5%。美国在2011-2020年间，美国制造业吸收的外资，占了其整个外资利用的一半。这些年强调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是过度或过早地让外资利用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

第五个问题，金融部门的开放深化有没有实现外资利用的扩张？这些年来，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迈开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从数据来看，金融部门外资利用的规模和金融部门外资利用的占比都在不断的回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第六个问题，自贸区产生的是外资创造效应还

是外资转移效应？自贸区要对接全球高标准的投资和贸易规则，那么自贸区对外资利用到底产生了什么效应？我们的研究显示，自贸区确实有利于促进外资的利用（所谓的“外资创造”），但是也把自贸区以外的资本吸引到自贸区来（所谓的“外资转移”）。如果把二者合在一起，自贸区设立所产生的外资利用净效应，就要打个折扣。

第七个问题，外资利用的独资化有没有打消“强制技术转移”的质疑？这些年来，在中国的外资利用里面，独资的比例越来越高，现在约占70%的水平，但是这似乎并没有消除所谓“强制技术转移”的质疑，这又是什么原因？

第八个问题，2008年通过了《反垄断法》，针对外资并购，有国家安全审查和市场集中度审查。在这之后，并购投资的规模和案例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那么，在规范外资并购行为的同时，是否也对外资的进入产生了一些影响？

其次，有关全球化发展的几个趋势。这个直接影响到国际资本的流向。

第一个趋势，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国内

贸易。到 2020 年，中国的出口依赖度约 19%，在 2008 年这一比例是 33%。与 2008 年相比，我们的出口依赖度已经下降了不少。目前美国的出口依赖度约 10%，日本的出口依赖度约 16%。一方面，伴随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与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内部市场挖掘方面，空间还很大。

第二个趋势，全球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区域贸易。在欧盟出口里面，向欧盟国家的出口占了 60%。在美国的出口当中，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它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它们合起来占了美国出口的 33%，也占到了美国前 15 大出口目的地的 45%。如果看日本的话，它的前 15 大贸易伙伴里面，来自亚洲的占了 11 席，对中国的出口占到了 22%。我们国家在 2021 年，对美出口仍然达到了 17%。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在发展区域贸易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个趋势，多边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双边贸易。在 WTO 呈“僵尸状”的背景下，各种双边的 FTA（自由贸易协定）就迅速发展起来。在中国

周边，韩国在李明博时期，就要打造远东的 FTA 中心。截至目前，韩国已经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签订了 FTA，包括在今年 1 月份与印度重启了 FTA 谈判。日本则与东盟、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签订了 FTA。在特朗普时期，日本与美国也签订了贸易协议。印度特别值得观察，它一直是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国家，但是今年以来，印度已经大幅度调整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自由贸易谈判上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印度已经与阿联酋、澳大利亚签订了 FTA，而且与英国承诺在年内签订 FTA，并预计明年与欧盟签订 FTA，还重启了与加拿大的 FTA 谈判。中国在 FTA 方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主要的经济体都还没有与我们签订 FTA。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0 年年底，中国与欧盟完成了 CAI 谈判。

第四个趋势，自由贸易一定程度让位于公平贸易。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往前推进的一个大麻烦。一是要素收入分配失衡。在收入分配里面，越来越多的收入给了资本，而不是劳动。二是所谓的顶层收入增长。根据皮凯迪 2018 年的研究，

超过 70% 财富由整个社会里面收入最高的 10% 的群体所把持。而根据 2021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个研究，三分之二的财富被整个社会里收入最高的 10% 的群体所把持。收入分配不公平很容易让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走向民粹主义。另外就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先后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到 2021 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然达到了 3900 亿，占整个美国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美国内部收入分配的失衡，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使得它越来越强调所谓的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诉诸公平贸易的话，未来可能就有两个趋势，一是强调对等开放，要求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到对等。二是在一国内部，强调各群体要利益均沾。

第五个趋势，便利化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安全化贸易。在以往，各种多边的贸易谈判都是去推动贸易便利化。但是这些年来，安全越来越成为各种谈判或贸易协定的主要议题。以前的产业链安排，追求的是 JUST IN TIME，现在叫 JUST IN CASE。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排，要考虑

安全因素。拜登在他 2021 年的一个行政命令里就提出，要有一个有韧性的、多元化和安全的供应链。以前，国际贸易以效率论英雄，现在强调兼顾安全，再往下可能是安全优先、兼顾效率，再接下来，安全议题可能被泛化和滥用。

第六个趋势，性价比贸易一定程度上让位于绿色贸易。所谓的性价比贸易，就是成本决定了竞争力，要素价格决定了竞争力。在双碳背景下，要追求所谓的绿色贸易。以前，国际贸易以性价比论英雄，现在强调兼顾环保，再往下可能是环保优先，再到环保议题可能被泛化和滥用。

第七个趋势，价值链贸易在一定程度让位于价值观贸易。美国、欧盟、日本，还有印度，都在尝试建立所谓的价值观贸易。印度的工商部长，最近有个讲话，就是印度将优先考虑与民主国家签订 FTA。

第八个趋势，所谓的“去俄化”贸易与“去中化”贸易。所谓的“去俄化”贸易，就是在能源贸易里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依赖。“去中化”贸易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去中心化”，强调产

业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二是“去中国化”，就是要降低对来自中国进口的依赖。以美国为例，2016年，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占到21%，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经回落到19%。

最后，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几点研判。

第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资本已经在转移，在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以及在最低工资标准不断被提高以后，劳动密集型外资就在不断地调整和转移。但是对资本密集型的资本而言，就没有那么突出。

第二个是出口平台型和市场追求型。在中国，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以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的资本，未来的发展空间会相对受限，但是把中国作为目标市场的投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是工业导向型和服务业导向型。伴随经济的服务化，服务业领域的外资空间很大。

第四个是产业导向型和产业链导向型。对于前者，它主要依赖从母国采购，离开中国相对容易。对于后者，它非常依赖中国本土的采购，这类资本不一定离开中国，即使在亚洲地区重组，中国也仍

然是它整个投资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第五个是传统经济导向型和新经济导向型。中国在新经济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包括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物联网、人工智能、低碳经济等。最近针对美国一个研究表明，美国机器人的使用，使得原来在墨西哥的投资回流到美国。中国如果把这些领域的优势进一步夯实，新经济领域的外资空间还是很大的，像特斯拉。

第六个是国计民生型和非国计民生型。涉及技术前沿和国家安全的投资，会有一定程度的转移。还有民生型投资，如口罩、防护服等的生产。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新加坡当时的贸工部长就讲了一句话，产业链过度依赖于一个国家，是不安全的。所以，涉及民生的投资也会有一些调整。

第七个是硬环境型和软环境型。在硬环境方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做得不错。如果在软环境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中国的引资空间还是很大的。

第八个是港澳台资本和非港澳台资本。香港资本的占比已经很高了，做更高的期待是不合时宜的。新加坡和韩国是仅次于香港和维京群岛的外资

来源地，从它们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以及它们对 IPEF 的立场而言，它们对中国的投资还是十分可期待的。关于欧盟，如果协定（CAI）能通过双方的法律程序而付诸实施。来自欧盟的投资也是值得期待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来自于美国、日本，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

**乔依德：**我向罗长远教授提一个问题。你最后讲到外商投资，特别强调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投资的占比一直不是很高。我的问题是，除了数量以外，它的质量怎么样？高科技含量怎么样？直观来说，欧美企业对于中国的投资，技术含量应该比较高的，你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罗长远：**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思考供参考。第一，在整个中国的外资利用里面，其实港资还是大头，美欧的资本相对比较少。第二，从技术含量上来讲，这也是共识，港澳台资本要比美欧资本的技术含量低。第三，其实也是研究方面的一个困惑，从跨国研究的角度看，也包括针对中国的研究看，外资的技术溢出一直是一个研究上没有共识的话题，就是说外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给东道国

带来技术溢出。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一直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结论。比较而言，美欧资本给中国技术溢出的空间，可能要高一些。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本是独资，它有更好的办法去阻碍本土企业的学习。另外，外资在带什么技术到中国来、以什么方式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方面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方面有期待，但是从数据上来看还要观察。

**乔依德：**谢谢罗教授。下面一位发言的，是上海美国商会总裁郑艺先生，下面我们热烈欢迎郑艺先生。

## **郑艺：跨国企业对供应链效益与韧性的重新考量**

**郑艺**（上海美国商会总裁）：很高兴今天能在上海解封的第一天参加这次讨论会，就供应链的一些最新发展动态跟大家一起交流。刚才几位嘉宾的讲话，我很受启发，有很多观点我都认同。我可能更多的是从跨国企业的视角来看供应链应该如何来

管理，聚焦在效益和韧性之间如何达成一个平衡。

上海美商会的总部在上海，我们大概有 3000 个会员，大部分是美资企业，也有一些在美国有经营的欧洲企业。我们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美国商会。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经营。最早是从珠三角，一开始是港资台资，逐渐有其他外资、包括美资企业也来投资发展。后来长三角成为外资发展非常迅速的地区。一开始以制造业为主，现在有了更多的服务业企业。外资企业看好中国制造业的要素包括：人口红利，中国庞大的人口，加上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制造能力和制造生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可以讲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南亚国家。所以不奇怪，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制造业的巨无霸。大到上海振华重工，在全球的港口机械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它的 Logo “ZPMC”。前一阵我们纪念中美《上海公报》50 周年的时候，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振华港机参与了美国旧金山海湾大桥的修建。小到小家电，有著

名的义乌小家电。因为中国具有发达和成熟的制造业生态，外资企业希望生产什么产品，只要设计出来，总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来帮你生产。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很强的。

虽然中国有这些要素领先的优势，过去几年，在制造业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不可否认的，我们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尤其在东部地区，包括上海。其实近几年，外资企业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先是把一些生产线从沿海地区向内地和西部迁移；随后，又向东南亚、南亚或其他国家迁移。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一些低附加值的供应链，逐渐离开成本比较高的中国一些地区。这主要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考虑，因为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在失去，所以企业必须要作一些调整。第二，就是中美贸易战。贸易战以后，特朗普政府增加的关税给中国制造带来很大挑战，因为你的产品如果出口到美国，成本增加了很多，平均增加大概 25% 左右。这就迫使一些跨国企业把它需要出口到美国去的产品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像越南等等。2020 年的疫情，应该讲对跨国企业供

供应链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先是从武汉封城，到今年3月以来疫情反复，上海的封城两个月，包括上海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整个供应链的阻断，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反过来也能看出，我们上海，包括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封城等突发事件，对跨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会造成很大影响。有一些跨国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会员公司，为了满足定单需求，就把一些定单转移到了第三国。这也是一个被迫的决定，因为上海封城两个月，上海周边地区整个供应链中断，无法满足它的定单，所以已经转出去一部分。

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次疫情以来，跨国公司如果说以前已经开始考虑供应链的韧性，以前只是在考虑中，现在可能会更加专注，会提到议事日程上，在效益和韧性之间要做一个平衡。在商业考虑之外，在供应链的管理方面，这些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商业的考量，包括逆全球化的趋势，还有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政治化趋势。以前以WTO为导向的这种全球化的贸易规则，受到了比较大的挑战。经济贸易合作开始向区域化发展，现在

有 RCEP、CPTPP 和美国最新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这些都跟以前的全球化有较大的不同。

另外，美国有一种逐渐形成的共识，希望美中经济的部分脱钩。我担任上海美国商会主席的时候，带领我们代表团去华盛顿，大概三四年前，第一次听到一个智库的学者提出脱钩这个讲法。当时我们觉得很难想象，美中两国经济已经到了这种融合程度，全球化已经走到今天，要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脱钩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几年，脱钩的趋势愈加明显，尤其是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领域，比如说芯片，美国已经对中国企业实行了限制。

俄乌战争不同的站队，国内大家比较少关注的，但是在海外也是一个问题，不同的站队可能加速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那么大的一个问题，也许并非在我们企业的商业考量范畴之内，全球供应链是否会因为价值观或社会制度而逐渐两极分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企业来讲，以前更多的是看机会，中国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但是这两年开始，大家更多的是看风险，因为企业最终还是要追求价值，价值怎么取得呢？其实价值就

---

是机会和风险之间的差，机会大于风险，它的价值就更大。一种做法是追求机会，不考虑风险；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是规避风险，把风险降低，实际上也增加了企业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跨国企业，包括美资企业，会更多地管控风险端，通过规避风险和降低风险来增加企业价值。

这就回到我基本的一个思路，从企业来讲，如何在效益和韧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呢？过去跨国企业非常注重效益，到中国来发展，就是因为中国有这些要素，供应链效率非常高，他们也推崇。刚才罗老师也讲到了“JUST IN TIME”这种经营理念。因为中国有基础设施、低成本劳动力、制造业能力、消费市场等这些优势，所以中国一直是跨国企业制造基地的首选。但是通过近年来一系列突发事件，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等等，跨国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其全球供应链战略。为了保证供应链的韧性，跨国企业希望逐步实现供应链多样化，并愿意在多样化的调整过程中接受额外的成本，即在效益方面可能要作一些牺牲，从而具有韧性，规避风险，增加价值。

从这点来讲，我觉得跨国企业也会重新考虑它的经营理念，就是刚才罗老师讲的从” JUST IN TIME” 到” JUST IN CASE”。以前更强调“及时供应”，将来也要考虑“以防万一”。大家讲的比较多的一个思路就是“中国+1”，因为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制造业基地，有很多优势，离开中国也不现实。在中国的跨国企业分两种，一种是以中国为市场，是不会离开的；还有一种是把中国作为供应链的一部分，这些企业也许会考虑把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但是还有一两个其他备案。

下面我简单举两家公司的案例。第一个是苹果公司。苹果的产品，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手提电脑，90%以上都是在中国，由代工的OEM来生产的。苹果公司在全球200家最大的供应商当中，有155家，大概占四分之三，在中国大陆有他们的工厂，而且工厂还不止一家，一共在中国有259家工厂，最著名的是富士康。同时中国还是苹果产品主要的销售市场，占苹果全球销售总额五分之一左右。近年来，苹果考虑90%的生产都在中国，会不会风险太大？为了增加韧性，开始作一些多元化

---

的调整。疫情的反复对苹果的冲击很大。苹果说，这个季度可能会减少销售大概 80 亿美元。这些年，苹果在越南和印度已经开始有一些生产，当然这个规模和中国还不能比，只是刚起步。苹果给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企业一定的压力，希望它能够增加在越南和印度的生产。一开始主要是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未来也会希望在越南和印度等增加生产，甚至出口。富士康、纬创集团等台资企业都已经在印度设厂。目前主要服务印度市场，也开始生产苹果最新的手机苹果 13。但是我觉得苹果会继续以中国为主要的生产基地，90% 可能是偏高了，将来也许会往下适当调整。通过在越南、印度等地增加产能，以此在效益和韧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另一个例子是富士康。富士康是台资企业，一直是苹果公司主要的代工企业。1988 年到深圳建厂，目前在中国大陆有 30 几家工厂，为苹果公司贴牌生产。富士康在郑州有员工数十万，全球的苹果手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富士康在郑州的三家工厂生产的。这些年，因为我们国内的成本上升，苹果也有要求，几年前富士康开始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

印度和越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挑战，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那里的工人素质、基础设施、市场等都跟中国差距非常大。最近听说富士康会派郑州工厂的员工到印度工厂去传授经验，也就是说，它在印度和越南的尝试并不太成功。但是我觉得富士康会继续供应链多元化的尝试。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富士康前几年宣布要去美国设厂，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承诺要投资100亿美元，生产高端平板显示屏，当时被特朗普称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观。但是因为很多原因，比如美国的生产成本非常高，也有当地的官僚制度等等，这个庞大计划基本放弃了，目前还在考虑如何转型。富士康在苹果的压力之下，将来会继续在其他国家寻找生产基地，以实现供应链的韧性。不过有一点不会变，中国还会是富士康一个主要的生产基地。

我觉得应该理性来看待产业链的转移。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了，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对中国其实是一个好的方向。转型初期，主导方是知名品牌，比如苹果。其实，代工的利润很低，刚才其他老师也提到，苹果的供应商在中国生产苹果

---

手机，在国内的附加值大概只有 5% 左右，绝大部分价值的归属是苹果公司和其他中间商。所以，从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制造转移，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

最后，我想说，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这些年，靠改革开放，欢迎外资，经济持续发展。我觉得不管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能吸引外资在中国持续发展。当然，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疫情的反复，尤其是上海封城两个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情况。我觉得外资对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会有一个问号。去年，上海美国商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当时，我们会员公司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前景还是相当看好的。2019 年和 2020 年这两年，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影响，我们会员公司对中国的信心有了很大的降低。过去，我们的会员公司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或者“比较乐观”的平均值在 80% 左右。到了 2019 年和 2020 年两年，就降到了 60% 左右，2020 年甚至降到了 60% 以下。2021 年有一个很大的反弹，我们会员公司对中国又比较看好，回升到 78%。我觉得长期来讲，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

发展，继续开放，外资应该还是会看好这种长期的发展前景。毕竟中国市场那么大，有那么多竞争优势，包括基础设施、熟练工人等等。但是短期内，我觉得外资会持观望态度。刚才有老师已经讲到日资的一些态度，就是在追加投资方面会有一个观望的过程。这个观望要多长时间说不准，要看今年下半年疫情管控情况。我们接下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外资也会观望。我希望中国能够持续发展，继续改革开放，给外资国民待遇。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外资包括美资企业，还是愿意在中国有长期的发展。

**乔依德：**下面我对郑艺提一个问题，你的发言讲的很全面，也举了例子，很有说服力。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你讲到一些跨国企业考虑效益和韧性，现在可能更多的要考虑韧性。我记得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聊过，当时有一个现象，每一个国家都说为了安全，我们要自己生产口罩，生产防护衣。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就像你去看医生，有时候医生为了检查你的功能好不好，用橡皮锤敲你的膝盖，你自然会弹起来。我的问题是，

这样一种考虑，是因为地缘政治严峻而带来的深思熟虑的考虑，还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郑艺：**我觉得还是一个大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从信息角度，你可以想象，一些跨国企业的总部在美国，因为我们管控的原因，将近三年没有机会到中国来。他们整天看的就是西方媒体的报道，接受了很多负面的信息。我们的一些会员，在中国的高管，不断地给到总部一些比较客观的信息。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担忧比较多。这次疫情，我觉得会使外资对中国的判断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我们去年做的调查，结果还是相当积极的，对中国的未来相当积极。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今年的调查，结果我还没有看到，因为调查还没有结束。我自己觉得，这个数字会往下掉，就是对中国的信心会往下掉。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前已经在考虑韧性、多元化、备案的问题，这次的疫情，尤其是上海封城两个月，会对外资起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应该讲，现在跨国企业会把未来在中国的投资，包括全球供应链的安排，做一个整体的考量。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未来的走向，包括今年下半年对疫情的管控，这些应

该是外资企业比较关注的。

**乔依德:** 现在的俄乌冲突也是地缘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请问从你了解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应该做什么, 才不至于使你们企业在西方的政治正确的氛围中, 不要受到很大压力?

**郑艺:**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中国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因为我们是美资企业, 毕竟从价值观来讲, 是一国对另外一国的侵入, 影响到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从这个角度呢, 如果我们在公开的说法上不这样提的话, 至少在人道主义方面, 要做更多的努力, 包括对乌克兰的一些援助。当然中国也做了一些动作, 但是从西方的感受, 好像做的不多。另外, 在维和方面, 在调停方面, 好像动作也不够多。大家都觉得, 中国对俄罗斯是有很强影响力的, 但是中国在这方面似乎也没有做太多工作。所以, 应该讲在这个时候, 我个人觉得, 俄乌冲突对中国是不利的, 中国本身已经面临很多的挑战, 包括这次疫情。在俄乌冲突上,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的国际声誉是很不利的。

**乔依德:** 关于数据治理，现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跨国企业的数据治理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

**郑艺:** 这个确实是比较挑战，包括 WTO 这套体系都没有针对数据的管理。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出来。今后有一个比较担心的事，就是将来数据方面也会变成一种相对的脱钩，不同的阵营根据本身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建立自己的一套数据管理体系。我觉得这违背了数据本身的一个优势，数据本来就是要很流畅的，但是实际上，在数据的分享和管理方面，不同的国家已经有各自的一些政策了。如何找到一个平衡，既保证国家的数据安全，在这个基础上又能够尽量满足数据的分享，这是一个很大课题，也是一个挑战。

**乔依德:** 谢谢郑艺。下面发言的是上海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先生，下面有请黄峰先生。

## **黄峰：本轮疫情对在沪外资企业的影响**

**黄峰**（外商投资协会会长）：企业外迁这个题

目也是我常年关注的。我 1996 年加入上海市外资委，以后一直都在外商投资领域。这次上海的疫情，应该说对外商投资企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疫情中，很多跨国公司的老们都跟我有非常密切的互动，把他们的一些想法、企业的一些动向跟我交流。另外，央媒，上海本地的媒体，也有很多对我的采访。我想把这段时间里我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思考，跟大家沟通一下。

首先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这次的疫情，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应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 40 年，或者说上海从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挑战最大的一次。前面也讲到了，因为我一直在做外资的工作，从上海市外资委，后来叫商务委，2011 年到 2016 年，我也在商务部的外资司工作，也是主管政策，包括统计这方面。我们在 30 年到 40 年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美国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包括在政治外交方面，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也面临过很多挑战。但是我的直观感受，这次影响，应该是过去 30 年史无前例的，这次影响非常大的。我非常赞同前面陈琦伟老师讲

的，对这次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能低估，需要非常认真的去分析，怎么样去应对。

接下来我主要讲两个方面，其实讲外迁之前，我想先讲实际上最近这几年，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意愿是下降的，我觉得我们其实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外迁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跨国公司还来不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虽然这几年，大家如果去看统计数据，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但是这个增长背后，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是下降的，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境外融资部分在增加的，因为我们统计外商直接投资，它只要是资本在直接投资的领域，跨境发生了流动，我们就把它纳入统计。所以我们看到了数据在增长。举个例子，比如说上海某一个互联网平台的境外融资额，最后纳入统计，是 55 亿美元。美国在上海投资最大的几家企业，通用汽车，迪斯尼，都没有超过 55 亿美元，一般就是 30 亿美元左右。这几年利用外资的数据在增长，但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是下降的，这是大家要非常关注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讲一讲外迁的问题。还是要深入来看，前面各位专家讲的，我也非常赞同，首先要把外商投资区分为两类，一部分是面向国内市场，这是因为我们的单一超大规模的市场，这部分的外资是不会走的。另外一部分，它是面向全球的，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这次的疫情对这部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前面徐奇渊回顾了外资企业外迁整个的历史，因为我一直做这个工作，我也非常赞同。其实外迁，要推到差不多 2008 年，因为我们劳动法，以及我们当时的两税合一，提高了成本，最早的一些外迁实际上是经济因素导致的。然后就是政治外交的因素，包括 2013 年中日之间钓鱼岛的事，以及 2016 年以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第三个因素是供应链风险，特别是在疫情，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两个因素叠加起来，跨国公司在供应链的效益和韧性（或稳定性）之间，要进行一个平衡。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跨国公司向外转移的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在面向全球市场的这个部分，我进一步把它细分成两块，第一块，就是大家前面讲到的一些劳动

---

密集型企业，在我看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是一个趋势。实际上从 2008 年以来，外迁的主要企业还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包括一些港澳台的，包括日本、韩国的生产加工企业，欧美企业转移相对比较少。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还有一类也是以全球市场为主的，但是它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一块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如果这一块的企业因为供应链的原因对外转移，这对我们经济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家芬兰企业，是做造纸机械的，13 米宽的纸张幅度，110 多米长的设备，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在我们上海生产，一年八套，四套在国内，四套要出口到南美。这样的企业还不是一家，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我专门问过他们，整个配套的零部件都是来自长三角。所以这对我们经济，对我们就业，对国内的这些产业链上配套企业的命运，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积极采取应对政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再举几个数据，我们出口的依存度，这些年一直在下降，现在只有 18.5% 了。外资企业在我们出口中间

的地位，上海三分之二的进出口是由外商投资创造的。我们协会每年做一个上海外企百强的榜单，外资进出口百强的前 100 家企业占了上海外资进出口的 50% 以上。上海的外贸进出口差不多占全国的 10%，如果这么算，上海 TOP100 的外资进出口企业占了整个中国进出口的 3.3%，就是这么重要的位置。如果这样一些企业因为供应链，包括其他一些政治因素，发生了外迁，那么对我们整个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讲三驾马车，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在疫情之后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疫情之前几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如果贡献出口的这部分外资企业再转移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会非常大，包括就业等等。所以，当我们讨论外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资本的流动对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但是对外资来讲，它转出去就转出去了。不像我们很多国内企业，可能把一部分生产制造放在外面，但是把研发等放在国内的，总体上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一种安排。但是对外资来讲，它走了就是走了。

简单的一个总结，结论就是说，这次上海的疫

情对整个上海，包括长三角外商投资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特别对那些以全球市场为主的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给予重点关注，因为他们在我们的整个经济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乔依德：**我对黄峰提一个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这次我们对疫情的应对给外资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的问题是，现在复工复产了，如果在今后半年当中没有出现大的反扑，你觉得会不会对外资企业之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所消解？或者能使外资高科技企业更安心地留下来？

**黄峰：**谢谢乔老师这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未来的3到6个月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今天早上，在我们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我们一家会员的中国区总裁从日本给我发了一个消息，他说：现在日本的企业，马上撤出是不会的，但是他们在非常认真地讨论、研究这件事，后面就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回答你的问题，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是这个观点，现在抓紧复工复产，帮助企业及时止损，为他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外部条件，

这是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其次才是出台政策。除了政策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些动作，要有一些姿态，要去安抚外资企业。大家也知道，在疫情中间有些外企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上海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心的问题。怎样去安抚企业，怎样去争取人心，这是未来三到六个月里，对上海也好，对中国也好，对外商投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动作至少跟我们的政策同等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因为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乔依德：**关于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应该做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黄峰：**我觉得现在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局面吧。俄乌战争，再加上现在的疫情，对我们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现在的表态和立场也已经非常清楚了。当然可能可以做一些小的方面，比如有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但是我想大的基调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还是首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先做好。

**乔依德：**谢谢黄峰，非常感谢。下面我们还有

---

一位发言的，是西门子中国执行副总裁吴永新先生，他的发言主要是讲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的挑战和机遇，欢迎吴先生发言。

## 吴永新：中外企业向外迁移的挑战和机遇

吴永新（西门子中国执行副总裁）：今天早晨一醒来，我就听到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关于咱们整个上海经过两个月的抗疫，终于解封了，我们希望上海满血复活。第二个是我接到西门子全球 CEO 的邮件，说西门子昨天跟埃及政府和伙伴签订了协议，打造埃及的高速铁路。埃及将构建全球第六大高速铁路网。西门子获得的业务定单，是西门子历史上最大的定单，81 亿欧元，我还是挺高兴的。

今天参加这个会尤其高兴的是，能够听到各位专家的意见，丰富我们的视角，同时我也注意到，参会者当中，恐怕我们是唯一一家在从事生产的企业，所以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西门子自从 1872 年为中国提供第一台针式电报机以来，跟中国已经走过了 150 年的友好合作历程，恰好今年就是西门

子和中国合作 150 周年的纪念。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西门子在中国，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经济当中。目前我们在中国设有 60 多家运营公司，其中包括 40 家制造业企业，4800 多名研发工程师，20 个研发中心，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有 11000 件有效的专利。而西门子在上海，是我们在全球海外最大的分支机构，从业人员有 11000 名员工。承载着西门子和中国多年的合作，能够参加这个会，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和一些感受，分享给各位专家，各位朋友，我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特别注意到，今天谈的题目是如何看待当前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所以我这个交流的视角，并没有集中在外商投资企业，而是从在中国运营的所有的产业的角度，怎么看待。我们在今天经济发展当中，有好多讨论，也是中国这个产业发展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总要想分中和外，比如在今天，地缘政治格局下，怎么看待中外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思考。围绕地缘政治，我听了前面各位专家分享的原因和分析，很受启发，归纳起来讲，我觉得中外企业外迁的原因，不外乎有这三

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的确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我们在日常工作对话当中，在我的案头，越来越多的对话，与所谓国家安全有关，与所谓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合作有关。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而造成人们对供应链重新思考，比如寻找更多的买家，再比如一些重大供应链，尤其芯片和半导体，需要考虑韧性问题。第三个方面，企业自身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各种成本的拉升，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失，导致各个公司，不光是外商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包括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也在周边国家进行有效的优化和布局，尤其在地区贸易协定，例如 RCEP 签订以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觉得这些，前面各位专家都已经分享过了。那么这种部分中外企业向外迁移，对我们经济发展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归纳起来来讲，也有三个方面，一是会弱化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影响。二是会影响中国的税收下降，因为如果是有这个扩张能力的，通常都是盈利效益比较好的，或者上升的产业。三是会给中国在劳动力就业岗位上，带来一些压力。这是我们对部分企

业外迁的认识和一些潜在的影响。

我们也注意到，像前面几位专家曾经提到过的，欧盟商会在中国的确发布了一个报告，提到中国作为投资的目的地，它的吸引力最近已经有些弱化，这是欧盟对在华的一些企业做市场调研，获得的认知。作为欧盟企业之一，从西门子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看德资企业，特别是德资上规模的企业，我们以为没有出现潮水式的迁移，尽管有些地缘政治的影响。从西门子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虽然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全球化作为发展的一种态势，还会延续，未来供应链的发展将会出现以中国为中心，以欧盟为中心，以美国为中心，区域化中心化的供应链的组合态势。我们觉得，全球化将会演绎成一个新词，我们管它叫全球本地化，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新发展态势。总而言之，由于今天的经济格局，全球经济体的布局，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即便有逆全球化的趋势，去年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还是增长了 20%。所以，全球之间跨境贸易还会继续进行，相互依赖对人类的发展是安全的，脱

钩或割离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地缘政治风险，甚至一些领域的冲突。

从西门子全球来讲，我们高层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其实美国的一些政要不大谈我们在市场上听到的“脱钩”这个理念，他们避免谈及这样的词语，用的最多的词语叫“多元化”。特别是针对将来全球经济态势，全球GDP总量，现在美国占24%，中国占20%，那么日本占5%，德国占4%，就是怎么样也避免不了和比较大的经济体发生胶着关系。随着这几年的转型发展，我们国家领导多次用到一个词语，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乌克兰战事之后，德国的政要开始反复讲，我们人类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认为在这种变革之中，还是应该要理智客观地来看待，不光要看到带来的风险，更重要的还是从中挖掘出机遇。所以根据今天的议题，我们主要的思路是想特别提倡中国怎么样利用这次变革，挖掘出机遇，来推升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从而能够实现中国的发展愿景。

主要的抓手我觉得有三项，第一个叫改革开放，第二个叫创新驱动，第三个叫构建合作生态体

系。这三个词，其实对大家来说都不陌生，我想稍微展开一点。

第一，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更加坚持改革开放。今天在座交流的专家，大多数都是 60、70 年代的朋友，我想大家都有体会，60、70 年代出生的人，可能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间，我们见证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那么改革开放到底带来了什么？其实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思维方式的转变，带来中国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带来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变化，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深度融入了市场经济元素。

回顾中国过去 40 年的发展，中国 GDP 的年均增速，达到了将近 10%，这是过去各个国家发展历史上没有的。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 120 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幅图画恰恰是美国 30 年前的图画，所以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跟美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国家，随着不断发展，也提出了一些宏伟的愿景和发展理念，比如说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要真想塑造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化发展，我们必须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实现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主要要体现在各类市场主体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我们不太主张一定分出内外。同时加快改革进程，要积极清理和废除那些阻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这种措施不是为了保护谁的发展，或者追求单一发展的目标。因为特别是从全球运作的公司发展历史来看，只有公平竞争，才能催生真正的创新，这是客观规律。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在这方面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包括刚才几位专家提到的，中国在启动了 RCEP 以外，又积极推进加入 CPTPP，也加入 DEPA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我们最近也在期待，随着中欧关系互动的深化，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不是也能够应时地带入到正常的轨道当中去。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回想过去 40 年，我特别关注到几位专家也提到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主体中有 2% 是外商投资企业，带动了 4 千万人的就业，创造了六分之一中

国的税收，创造了五分之二 的进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作业，它有一个效果，特别是在今天这种双循环发展的理念下，不但能够在中国来创造内需，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由于它在海外的布局，还可以有效地帮助塑造出口市场，海外市场。实际上在乌克兰战事以前，去年 11 月份，由德国商会做的一个市场调查报告说，70% 的德资企业还是立志于在中国，有投资发展的计划。我们西门子公司在中国，除了刚才我分享到的制造业研发中心以外，下一步的举措就是希望有序地把更多带有全球总部职能的运营机构嫁接到中国来，目前我们在上海设有全球低压电机和低压电气总部。

第二点我想强调一下，以创新驱动，让技术有为来引领中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才我提到创新，经过中国若干个五年规划的发展，特别是十四五规划，又把创新驱动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打造出了很多领军型的企业，比如说风电领域、在线支付、数字货币、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这些技术和企业都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这也是为什

么美国要积极和欧盟搞贸易技术委员会，并在未来技术领域积极打造脱钩，以应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此，我特别想强调的，除了创新以外，就是今天中国自身定义的两个发展战略，值得我们在所有产业界积极践行。一个就是数字化转型，因为这个数字化转型，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有丰富的工业门类，从制造业转型来讲，这个转型正好从人的互联，迈向物的互联。有一个预测，到2029年，全世界将有150亿台设备被连接，而中国已经在人与人的互联上面，媒体互联上面，阿里、微信等等，走到了世界前端。中国下一步要做的，是在垂直和行业领域当中，怎么样让人和机器，让机器和机器，实现互联。在这方面，我相信中国的产业，不管你是内资外资，在这片硕大的市场上，借由整个制造业平台来发展，是有无限商机的。

有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在工业领域当中，60%的制造流程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如果中国践行的话，中国可以有效地化解由于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和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在基础设施领域当中，通过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 20% 的效能，上海地铁线如果改变信号技术的智能化水准，就能够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提高运力。

另外一个中国的发展战略，就是双碳战略，2030 年的碳达峰和 2060 年的碳中和。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刚才前面谈的数字化技术，本身就是绿色技术。除此之外，中国用好已经取得领先的一些可再生能源行业，比如太阳能，风电已经进入到欧洲市场，比如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动汽车电池，以及绿色氢能，我们认为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西门子在中国有 150 多年的合作经验，我们是要百年坚守，扎根中国，作为一家专注的科技公司，我们将努力深入到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做贡献。实际上我们在中国各个省份都在践行我们的行动，比如 2013 年，我们在成都打造了全世界首家数字化工厂，下个月，我们将在南京启动首座原生数字化精密工厂，将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自己的零碳先锋计划，帮助供应商，帮助客户，实现减碳发展。这是第二条，就是怎么样

---

来通过创新驱动和技术，实现我们的发展，实现中国产业的转型发展。

第三点，我想强调，特别主张构建跨国的合作生态体系，来共同应对人类的挑战。当今的世界，就好比是一艘航行的大船，尽管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是如果船内某个舱着火了，如果人们还在相互争斗，是没有意义的。通过新冠疫情，通过第四次革命的变革，我们有一个认识，要对全球挑战进行管控，要把工业革命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企业，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到这一点。所以一个包容开放的生态体系就变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和中国在格拉斯哥会议上达成了有关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共识，我们也看到了全世界的平台公司，GOOGLE，苹果，甚至我们中国的百度，阿里，其市值已经超过了所有能源公司，石油公司。这种平台业务本身也揭示了生态体系通过协同来创造价值。

归纳起来讲，我们主张客观、冷静看待中外企业外迁所带来的风险。同时，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

---

发现和利用当中所孕育的发展机遇，坚持改革开放，打造公平包容稳定的营商环境，以创新驱动和构建全球合作生态体系，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愿景的关键举措。

**乔依德：**问吴永新先生一个问题。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德国在很多方面是优等生，但是也经常受批评。德国因为外贸顺差比较大，所以受其他国家批评。现在也受批评，其中有一个批评是对中国的依赖比较大。你们新的外交官讲话比较硬。我看到最近有个消息，德国一家很大的公司要在中国投资，德国政府拒绝为其作担保，这个在历史上好像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吴永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最近和德国的政府，尤其是使馆体系的官员有很多对话，能够看出德国的政府和产业界在很多问题上有些观点不一样。从德国政府的举措来讲，主要的原因，一是前面讲的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有关，而地缘政治实际上是安全问题，尤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后，让德国的政界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

我能不能不依赖谁，而实现我自己的经济发展。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在欧盟的框架内，一直追求一个所谓的对等原则，如果市场开放竞争，你开放，我也是开放的，那咱们大家竞争，欧洲对中国这个市场持不同的认知。比如中国要去并购德国的企业，政府原来在投资股比占 25% 开始审核，现在调低到了 10% 开始审核。这些一是来自于地缘政治安全，另一个是经济体制，基于他们的认知，“中国不对等的做法”需要“对等”的政策杠杆来予以平衡。但是德国产业界，从市场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的认知还是比较客观理性的，少一点情绪化的元素。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点，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和一个国家的关系。如果一家企业只依靠一国市场，与该国会形成上下监管关系，但如果该企业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公司，放在全球角度来看，是一个全球公民，它和国家的关系可能就呈现出另外一种格局。所以我们觉得，作为跨国公司来讲，市场所在国政府的动向是需要关注的。你刚才问的问题，简单讲，一个是政治考量，一个是贸易对等关系带来的影响。

**乔依德:** 现在的俄乌冲突恐怕也是地缘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你了解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应该做什么, 才不至于使你们企业在西方的政治正确的氛围中, 不要受到很大压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也有挑战性。

**吴永新:** 其实中国政府的表态, 全世界都听到了。如果真说中国要做什么, 我觉得中国应该尽快走出疫情, 让边境打开, 让交往和交流成为可能。刚才咱们提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西方很大一部分看法的原因, 是来自于我们的话语权在海外是听不到的, 是没有的。所以一个就是迅速走出疫情, 让经济和交流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前面提出的, 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改革开放, 把自己的国内营商环境树立好。

**乔依德:** 如果中国对乌克兰, 比如和德国合作, 加大人道主义援助, 你觉得行不行?

**吴永新:**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中国已经对乌克兰做了人道主义援助了, 单方面的。如果中国有既定路线, 站住了, 站稳了,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世界有三极, 欧洲、美国、中国, 从经济

角度来讲，是这三极。从地缘政治来讲，俄罗斯、中国、美国，还是在那里，就怕中国的站位，出现了偏差和不一致性，可能会带来影响。

**乔依德：**谢谢吴永新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恐怕我们不能再往下开了，非常感谢六位演讲嘉宾的精采演讲，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也回答了很多问题。也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讨论，特别是上海的听众在复工复产的第一天来参加我们会，当然北京也有，感谢你们的参与。今天的研讨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中美关系何处去？

- 弗雷德·伯格斯滕 (C. Fred Bergste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创始人、名誉所长、高级研究员；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系列座谈会第 72 期 2022 年 6 月 25 日

**乔依德**（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大家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参加今天的会议。大家可能知道，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之间有很

好的学术关系。亚当·波森（Adam Posen）所长问我是否有兴趣和伯格滕先生（C. Fred Bergsten）一起举办视频会议，因为他刚刚写了一本新书，书名是《美国和中国：谁会是未来全球经济领导者？》（*The United States vs. China: The Quest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我立即表示十分乐意。伯格滕先生曾在白宫国安会任基辛格经济事务顾问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助理财长。然后，他作为研究国际经济学的学者，与中国关系匪浅。他谈吐幽默且富有哲理，特别是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新观点和新定义，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有条件的、竞争性的合作（*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所以，我们邀请他，希望他能向我们介绍一些关于新书的想法。此外，我们非常幸运地邀请到四位专家参加这次讨论，他们分别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今天会议的形式

如下：首先，伯格斯滕先生将用 20 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做一份报告，介绍他对自己新书的主要观点。然后，中方各位进行大概 10 分钟的发言和评论，演讲者也会回应评论；最后，我们会有 20 到 30 分钟左右的问答。现在可以开始了。

**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名誉所长、高级研究员；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非常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举办这次的研讨会。我认为，在中美两国关系不是十分友好的情况下，我们这样的专家学者亟需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努力提出改善局势的新想法，像今天这样小范围讨论的形式再适合不过了，会议十分合时宜，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我想先说一件事情，上周在日内瓦举行了 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和中国在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使这次会议得以圆满成功。如果没有放弃疫苗的生产专利，世界各地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将无法开始生产疫苗。同时，这也是对 WTO 的一次重大考验。如果没有这项协议，整个部长级会议可能就会失败。相反，这至少在恢

---

复 WTO 的信誉和加强世界贸易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对我来说，这是中美合作一个非常积极的案例，因为他们是决定性的谈判者，所有与会者也都同意这一点。正是中国和美国展示了共同的全球经济领导力，使 WTO 部长级会议取得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建设。换句话说，这是相当可行的，是很有可能的。尽管双边关系中存在种种困难，但两个经济超级大国能够在开放和合作的世界经济中，在追求各自的利益的同时达成一致是令人寻味的。这也为我正在讨论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竞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背景。我的书得出了三到四个相当简单和直接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也十分乐意听到各位的一些评价。

第一个结论，就是尽管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大家都认为现在中国在全球经济实力方面与美国大致相当。书中有一章对中国和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变量进行了比较，得到的结论是：就 GDP 而言，两国没有太大区别，无法说明谁大谁小；在半导体的生产上也没有太大区别，这对两国具有深远

的影响。对美国而言，是自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100年以来，对其经济霸主地位的第一次真正挑战；对中国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几百年前其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两国需要新的思维，来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中国自然而然地发展，并且几乎快赶上美国了，理应想要寻求、也值得成为全球经济领导中的关键角色，成为世界经济管理者之一，引领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它也引发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崛起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之间的传统对抗，这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我的书中也从经济层面中提到了。并且，我们已经有一场贸易战了，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新兴大国和现有大国之间可能会发生真正的战争。我认为在经济层面上是可以分离的，我们已经有了了一场贸易战，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两国之间可能会有更广泛的经济冲突，甚至可能会有一场新的冷战，或者出现更糟的情况，现在的情形预示了这些风险。

第二个问题，就是对我们已经从中受益、大约

---

维持了 75 年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挑战，在我的书中也重点关注到了。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并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领导。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接近美国，美国再也无法独自发挥领导作用，十分有必要与中国合作来共同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但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能够像过去一样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中国是否准备好承担这种领导角色？当然现在中国的能力似乎表明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在书中将此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因为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urger）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就是由于当时代全球经济领导地位未能成功地从英国传递到新崛起的美国。当时，英国人已经无力领导全球经济，但是就像金德尔伯格认为的那样，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承担领导责任。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并呈螺旋式下降趋势，世界贸易减少了一半，无人救助无力偿还的贷款人，世界陷入了大萧条。所以，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强国，金德尔伯格陷阱是这种新结构的真正风险。

现在，一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美国应该试图遏制中国，阻止其继续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从历史和现状我们可以知道，尝试这样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肯定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体量很大，生机勃勃，没有其他国家会愿意加入美国的行列来压制中国。特朗普尝试了4年，但结局是失败的。因此，我认为可以完全抛弃遏制或试图压制中国的想法。美国有一些人抱有这样的想法，但这是一条死胡同，是一个可怕的想法。通过我与美国政府和其他美国人的讨论，我在我的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

如果上述我说的都是正确的，那么书中的第三个主要结论，就是美国和中国至少需要在全球经济问题上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南海等一些安全问题上，两国将继续存在分歧；在政治和人权问题上，两国将仍然持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即使这是真的，我们也应该能够在经济问题找到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合作，能够在更加繁荣、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在两国的友好经济合作关系中，实

---

现我们的共同利益。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四个主要结论，也是我想花更多的时间进行阐述并且希望得到评论的地方，就是我所说的“功能性脱钩（functional decoupling）”。中美必须将国际经济问题与南海等安全问题和香港等价值观问题脱钩，这种“功能性脱钩”远远优于中美整体脱钩。即使我们在安全和政治问题上将继续存在分歧，这种经济运作模式将促进我们双方受益，同时促进一个持续繁荣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我提到的“功能性脱钩”提议与通常使用的“脱钩”是不同的。当人们说“脱钩”时，他们通常认为是在总体意义上解除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在所有的领域中应当减少两国之间的联系，从而变得越来越对立。

我的想法是越过其他领域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功能性脱钩将允许我们在经济领域继续合作。这样做有三个简单的理由。第一，两国相互依存了将近 40 年，这样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我们获益。在过去的几年里，虽然我们的经济联系有所减弱，但仍然非常广泛。两国仍然从中广泛受益，我们理应

维持这一现状。第二，我认为更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只有美国和中国合作，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成功运作的全球经济体系。我们两国是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世界各地的其它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有限。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在未来流行病的防御上，在开放的贸易体系的恢复上，或是解决像 12 年前那样的全球经济危机上，两国必须达成一致的想法。如果没有合作，没有美国和中国意见的一致，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至少不可能有效和成功地实现。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整个世界都将受益匪浅。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全球经济体系能够继续促进世界各地的繁荣和稳定，那么第三个好处是对我们两国之间整体关系的溢出效应，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修昔底德陷阱，近几年的贸易战争和经济冲突使我们整体的关系恶化。这说明两国关系的发展有较大的空间，也是相当可行的。如果我们能恢复经济方面的合作，防止关系恶化，努力利用改善的经济关系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全面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安全和政治方面的困难，那肯定会

好得多。

如果这是可取的，这意味着什么？假设我们可以实现功能性脱钩，可以拿什么比喻？在描绘我们的经济关系中，我使用“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这个术语。从短期来看，可以在完全互惠的基础上减少贸易战。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美国应该降低对中国进口商征收的关税。我相信中国也会投桃报李，取消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这将会为我们各自的经济、世界经济和两国之间的整体关系赢得巨大的胜利。这将是长期的过程。

中国在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 IMF 的投票权分布将发生改变。现在，在经济规模、技术进步和其他指标方面，根据我在书中列出的公式，表明中国在 IMF 中的代表性应该与美国和欧元区并驾齐驱。这是我们的目标，不仅认识到结构状况的变化，也努力实现我所说的功能性脱钩。

现在，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好，但这可能吗，实用吗，是否可行？美国会同意这种做法吗？正如我

所提到的，在美国，包括国会在内，两党达成一种强烈的共识，就是认为中国是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应该尽可能对此做出明智的回应。事实上，中国的挑战正在美国推动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事情。美国会 2021 年通过了总额约 1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美国会将很快通过一项新的竞争力法案，该法案将大大增加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试图加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挑战。这些都是美国国内需要进行的改革，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让美国国内做出这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尽管美国对于与中国的竞争有相当广泛的共识，而且也做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本身应如何发展并没有共识，观点非常多。

我试图做的，是提出一个可能的行动方案，我认为这将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拜登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计划，也没有对其与中国的关系提出任何愿景。然而，已经有了一种构造，就是允许这种功能性脱

---

钩。拜登总统本人和他的高层人员已经制定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框架，他们称之为对抗、竞争与合作。在上任前他们就计划了这件事，在上任时也强调保留这样的计划。他们还没有真正阐明如何实施它，或者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前参议员国务卿克里一直试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密切合作。

正如我所提到的，在日内瓦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甚至上周的 WTO 会议也在尝试维持两国之间的全球贸易体系。所以我认为，官方组织已经暗示了我所谈到的美国试图与中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美国对中国态度最强硬的鹰派，也充分认识到在广泛的全球问题上需要合作，如气候变化、流行病，甚至在一些经济问题上的合作。甚至特朗普的政策建议者马修·波廷格也曾官方发言，称必须在这些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大门是敞开的，当然没有完全敞开，我们也有相反的倾向，但是我认为美国朝这个方向前进是相当可行的。现在你们可能仍然持怀疑态度，并对出现特朗普重新执政的情况提出疑问。

我但愿特朗普不会回来。即使我们在两年或六年后有共和党政府，他们也不会像特朗普一样是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我认为，他们也会对我所说的事情持开放态度。

最后，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主要问题，希望你们在发言中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全球经济问题上，我提出的建议对我们两国来说既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政治上可取的。我认为美国至少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但我们都需要推动它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倾向于将跨领域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些中国官员说过，中国不会同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合作，除非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关系有所改善，这将与我所支持的功能性脱钩背道而驰。此外，我们知道一些经济问题是由于中国的一些政策，例如 10 年或 15 年前的货币操纵，以及现在的一些贸易和投资政策，这些政策都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地方对中国的强烈反对。当然，特朗普是极端版本。因此，正如我所说的，作为领导全球经济的主要国家，当其经济能力开始与美国并驾齐驱时，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为

---

了促进一个更加安全和持久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再次感谢大家，能够给我与大家交流的机会。我期待着你们的答复，十分感谢大家。

**乔依德**：谢谢，感谢你对新书的主要观点做了很好的总结，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在你的演讲结束时，提出了征求对你的新想法的看法。我想也许所有评论员都在为此做准备。现在将由余永定先生进行评论。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非常感谢你的演讲，可以说是精彩绝伦。二十多年来，我和弗雷德常就各种问题进行非常坦率的讨论。所以在这里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说由于时间限制，我不能读完新书的所有章节，以后一定全部阅读。

现在我将阐述几个观点。首先，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观点：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拒绝任何遏制中国的努力。而且遏制也不会成功，只会适得其反，只会促使中国更加努力争取成功。你还认为，

美国应该推行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政策。竞争体现了两个经济体之间对立的特征，条件性将要求两国增加对彼此的承诺，并更广泛地履行其国际义务。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有条件的竞争合作也许是美国人可以采取的最好的政策。

你问新崛起国家和在位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是否也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竞争当然是存在的，这种竞争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认为，如果我们相信中美之间复杂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冲突甚至冷战，那么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警告的那样，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不是一个决定论者，我相信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可以说是确定的。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防止我们跌入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两国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太可能像它们口头上说的那样热衷于脱钩。中国对美国的行动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方式，“礼尚往来”，对美国的行动做出回应，但不主动挑起斗争。另一方面，美国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关税排除体系”。中国

也建立了相应的体系。通货膨胀正越来越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我不认为美国贸易代表会固执地做火上浇油的事。

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寻求的是革命性的，还仅仅是修正主义的变化？弗雷德指出，中国从开放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对此我没有异议。中美两国都是当今开放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的受益者。弗雷德称中国为修正主义者，我倒宁愿称中国为改革者。

弗雷德批评中国无视关键的规则和国际传统体系的规范。我不得不说，我不能同意这个判断。我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中国从未无视关键规则和国际传统体系的规范。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遵守了所有 40 起针对中国案件的裁决结果。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在这些案例中往往是失败的一方。相比之下，据我所知，美国的记录要差得多。

弗雷德用中国对汇率的干预来支持他的论点，即中国无视传统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因为我们从 2000 年代初就非常了解彼此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

立场，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首先，事实上，美国财政部拒绝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者。为什么财政部没有这样做？我想一定有可靠的理由。其次，2014年中国的出口部门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但对于作为一个总体的中国来说，谁知道这到底有多大好处呢？第三，从2003年到2014年，美国的总预算赤字为8万亿美元。2009-2012年，其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9.8%、8.6%、8.3%和6.6%。中国人民银行购买美国国债和国债对美国有很大帮助，这使得美联储实施QE更加容易。中国出口的竞争增加了美国失业人数，这也是事实。但总的来说，我不确定美国应该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表示感谢还是愤怒。我在这里不是为中国辩护。我想说的是，经济政策就是经济政策。因为某一项政策，有的人有所得，有的人有所失。对同一项政策，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谁对谁错，谁知道呢？在我看来，关键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将有争议的经济政策提升到地缘政治的层面来处理。

就像一些美国学者所做的那样，弗雷德讨论了

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也许正如弗雷德指出的那样，世界需要合适的领导。一些人说，中国领导人声称到 2050 年，中国应该成为全球领导者。根据一些美国学者的说法，北京的最终目标是在 2049 年之前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个目标一无所知。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谁在乎呢？中国没有成为霸主或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的目标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没能做得更好的话，中国会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所谓“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全部。

弗雷德提醒我们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陷阱，我称之为阿富汗陷阱。大英帝国怀疑俄罗斯帝国对印度怀有野心，俄罗斯帝国怀疑大英帝国计划插足中亚。英国人入侵了阿富汗喀布尔，结果 16000 名士兵中只有一名幸存者。然而，后来的档案显示，任何一方都没有任何相关计划。入侵计划只存在于野心勃勃的年轻

官员的想象中，尤其是在英国外交部。

弗雷德提出了“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的政策建议。我认为这是一个现实和建设性的建议。我赞赏弗雷德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美合作所做的努力，不管它的名字叫 G2 还是其他。我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希望他的建议能被纳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弗雷德的书让我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也祝贺弗雷德的新书出版。

**乔依德：**谢谢永定。谢谢你对于我们共同朋友的很好的看法，你对他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这都没关系。下一为发言的是吴心伯院长。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早上好。我发现伯格斯特滕先生在他的书中提出的论点，非常理性，有建设性，而且非常明智。他对中美在经济领域合作的看法，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好时光。2008 年之前我在华盛顿特区做研究，现在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很高兴伯格斯特滕先生继续致力于促进中美合作。我同意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的领域可以合作。经济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政治学家。因此，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是：共同利益或平行利益不会自动导致合作，两国之间的合作发生需要政治意愿，产生政治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互信任。然而，现在中国和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两国之间的巨大信任赤字。这种信任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唐纳德·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合作也将非常困难。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讲话，我国外交部发表长文回应，指出布林肯讲话中有关中国的二十一项谬误。这意味着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叙述，是两国之间不信任的主要来源。让我仅提及其中的几个。首先，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第二，中国在意图和能力上都对当前国际秩序构成了最严重、最长期的挑战。第三，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是竞争，同时兼顾对抗与合作。第四，中国和俄罗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所有的这些关于中国的叙述，从美国国内的角度来看，是政治正确的。然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或者从比较

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扭曲的、夸张的，最重要的是，它对中美关系来说是适得其反的。

为什么美国对华叙事对中美关系如此重要？因为它表明了美国的意图，支撑着美国对华政策逻辑，塑造了美国精英和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说，特别是对拜登来说，如果他们真的想与中国建立更加合作和富有成效的关系，第一步就是改变从特朗普那里继承下来的叙事方式。

美国对华叙事应该做出如下调整。首先，中国既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与中国的有效合作是实现美国重要国家利益的关键。第二，中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随着它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雄心勃勃，正在成为维护当前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虽然它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但如果这些挑战得到很好的管理，可以促进当前国际秩序的健康、建设性的演变。第三，美国对华政策应同时关注竞争和合作。管理竞争，扩大合作。第四，中国和俄罗斯在许多其他方面是不同的，二者的历史、文化不同，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态

---

度也不同，战略也不同。因此，我认为美国对中国叙事的改变，虽然不足以促成两国之间的合作，但它将向北京发出一个非常明确和积极的信号——拜登政府选择采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对华方式。

特朗普政府当然想要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我相信拜登政府想要与中国进行更平衡、更理性、更富有成效的接触。但不幸的是，由于他们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太多约束，因此他们既不能改变对中国的叙事，也不能对特朗普制定的政策做出重要调整。例如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拜登在竞选期间指出，这种关税没有用处，对美国的伤害比对中国的伤害更大。但上任一年半后，拜登仍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任何事情。这表明拜登政府缺乏政治意愿。在最近的视频对话中，习主席告诉拜登总统，美方的一些人不想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转化为政策。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现在，回到伯格斯滕先生提出的问题，中国是否准备与美国合作？我们时刻准备着，甚至在拜登赢得选举入主白宫之前，中国就已经为如何重启这一关系制定了蓝图和路线图。但是一年半之后，中

国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我们看不到美国采取必要的行动。因此，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如果他们能够在特朗普关税上采取一些必要的正确行动，这将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也可以在许多其他领域加强合作，包括气候安全和全球安全。但时间在流逝，我们需要像伯格滕先生这样的智者和有影响力的人在华盛顿发出你们的声音，呼吁人们迅速采取行动。

**乔依德：**谢谢吴心伯。下面有请张蕴岭教授。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弗雷德，很高兴能见到你。我和弗雷德曾经为推动 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有过长时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在复杂形势下提出如何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的思考和建议。这里我仅提出几点看法。

在书中有这样的内容：克林顿总统担心如果接纳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担心将来中国在发达之后说会与现行机制说“拜拜”，另搞一套。今天好像验证了当年克林顿总统的担心。这也是现在美国

政府对中国实行遏制，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的重要原因。如何认识中国的确很重要。我的理解是，中国不会另起炉灶，但中国是一个新兴大国，确实想做一些与现行体系不同的事情，希望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改革。正如书中所提到的，比如 IMF 的投票权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推翻重来，是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起进行，中国会与各方坐下来讨论怎么做，而不是由中国单独来做。我写文章也提出，中国是推动改革现有的体系，而不是离开现有的体系。

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不能再主宰世界，这是事实。因此，关键问题仍然是如何应对当前和今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中美对抗没有出路，也会影响世界发展。书中试图将经济关系与政治和安全问题分开，这是有道理的，可以避免一些敏感问题，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不过，许多人可能不这么认为，实行起来不容易。

书中提出中美开展有条件的竞争合作，关键是如何定条件，谁定条件。在我看来，可能用竞争与合作更好。竞争是正常的，因为国家间，市场上都

会有竞争。竞争而不对抗，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竞争的同时寻求合作是有利的。竞争与合作看似矛盾，但并非不可行。拜登总统提出的，中美之间应该立栅栏，防止越线对抗，要管理分歧，这也很也重要。中国和美国需要坐在一起讨论如何管理风险，如何防止全面对抗，如何寻求合作。现在的危险是，中美关系整体环境似乎正在恶化，而不是变得更好，需要决策者坐在一起讨论。

APEC 是链接亚太地区的框架，问题是，美国基本放弃了 APEC，转向印太。拜登政府对 APEC 的政策究竟如何呢？APEC 是联系中美、北美和东亚的机制。从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由亚太延伸到印度、印度洋地区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进程，有必要建立链接，推动合作，印度已经参与东亚，进一步建立 APEC 与印度洋区域合作机制也有必要。但美国推印太战略不是这样，在印太战略设计中，美国力图将中国从区域框架中分离出来。没有中国的参与，就没有 APEC 的延伸，也没有这真的印太。我曾提议，我们能否创造一个 APEC+ 印度圈联系机制，但这个话题现在没人听了，只讲排除中国的印

太，这对该地区的发展非常不利。原来 APEC 是通过构建地区框架把美国、东亚连在一起，印太是安全和政治导向，尽管拜登政府也谈经济，但主要是排除中国的战略竞争。

我们必须维护多边体系运行。上周 WTO 会议达成一些合作共识，但还是非常有限。仍不清楚美国政府对 WTO 多边体系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阻止其运行，现在的政府也不怎么积极，把主要的努力放在拉拢集团上，实际上并没有回到正确的方向，没有推动多边体系发挥作用并进行改革。

如何理解中国很重要。现在，美国和中国可以有共识的词汇似乎不多，即使伯格斯滕先生谨慎地使用有条件的竞争合作这样的词汇，好像在美国也难以被接受。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变化的国家，以变化眼光看中国至关重要。当前中美竞争的本质是什么，是经济，还是制度？如果是制度上，竞争似乎就没有妥协的余地。中国当然不同于美国，但中国与世界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中国并不是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不是与当今世界和现有体系完全分离。

伯格斯滕先生写了一本好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美国和中国不应该对抗，又竞争，有合作，不对抗对世界有好处。

**乔依德**：谢谢蕴岭，你的演讲非常精彩，分享了你对这本书的看法。最后一位中国演讲者是黄益平，他刚刚参加完毕业典礼。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很高兴参加讨论弗雷德的新作。我和弗雷德的交流最初是从“不打不相识”开始的，十几年前我刚刚回到北大工作，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克鲁格曼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指责，弗雷德看到我的文章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的批评，之后我趁着到华盛顿访问去跟他做了面对面的交流。现在还记得有一次跟几位同事去彼得森研究所拜访弗雷德，他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手上拿着一瓶带有 G2 标签的矿泉水瓶，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G2 是当时弗雷德倡导的一个国际治理框架的概念，即世界治理的主导权最终要从 G7 或 G20 演进到 G2，由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强国共同合作解决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这是相当有勇气、有远

见的战略性思路。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格局包括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弗雷德写作了这本新书的主要出发点，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里如何定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弗雷德的思想 and 主张还是一如既往地富有建设性，虽然从之前的 G2 到现在的“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退了一大步。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局面，不仅是中美关系，还有全球治理，“冷战思维”已经主导了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因此，他的建议是非常冷静，也非常有价值的，希望能引起中美两国的知识界和决策层的重视。这就是我读这本新书的总体印象。我要再次祝贺弗雷德。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三个观点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与弗雷德和今天参会的其他朋友分享并讨论。

第一点是全球化正处于危险之中。当我们回顾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成就时，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其实是全球化的最大的获益者之一。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

策，当时也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中国在那个时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增强了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三十年间，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两大外部因素，一个是出口，另一个是外国直接投资。可以说，早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际经济大循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恰逢全球经济正变得更加开放，走向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基本上可以只计算经济因素（如比较优势导致的效率等）来决定与谁做买卖、在哪里投资，其它因素相对而言都不是那么重要。

在包括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即国际秩序。当下的国际秩序是由美国带领下建立并维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维持交易的秩序。有时候听人说“美国是太平洋警察”，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正面的描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战以来的很长时期内，美国提供了全球公共品。不幸的是，最近美国的这个功能开始发

生变化，而变化主要体现在美国自己的一些新的行为。在过去几年，美国试图限制其它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最近美国联合其盟国一起制裁俄罗斯，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并将一些俄罗斯商业银行踢出 SWIFT 系统。这些行为意味着美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维持国际秩序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对于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将来参与国际经济交易，再也不能单纯地看经济因素，同时需要考虑交易对手是朋友还是潜在的敌人，因此，未来贸易模式、供应链和投资的协同效应将发生变化。

我并不是说全球化就此终结了，但展望未来，我们跟其它国家做生意时必须更加谨慎、更有选择性，中美之间尤其如此。全球化也许会继续，但可能会变得更加区域化、集团化。

第二点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再也不会是好朋友，但解决世界挑战离不开两国之间的合作。不是朋友、不是盟友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可能是弗雷德当年提出的 G2 的一个基本构想。但当时的假设是，中美仍然可以在国际秩序和经济制度下一起共

同工作，解决一些问题与挑战，虽然可能会碰到不少困难。可惜的是，在过去五年，中美之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大，合作空间越来越小，在一些领域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出现了封锁与脱钩的趋势。简单地说，我们不太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日子，但生活还得继续。中国还将生活在这个在未来很长时期仍然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而美国也不可能轻易地干掉中国，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

弗雷德提出的“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的构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虽然三观不合但日子还得过下去”的矛盾的一种方式。局部脱钩已经不可避免，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已经十分困难，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变得非常微妙，即便如此，也还是要竭尽全力避免砸锅、掀桌的行为。弗雷德的建议是划出一些“条件”，有些领域没法合作，有些领域可以合作，在这个前提下，双方竞争、合作。这个思路如果得到采纳，相信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甚至有望缓解国际经济的紧张局势。也唯有如此，全球化才有可能持续下去。

第三点是我对弗雷德的一个问题，这种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能不能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弗雷德的设想听起来不错，“该对抗的领域对抗，该竞争的领域竞争，该合作的领域合作”，但这种模式的动态走向是什么样的，是一种稳态的均衡、还是很可能会滑向两极？在一些领域相互脱钩，然后在剩下的领域像往常一样继续保持业务往来。但在现实中，这种这种分隔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法是找到有很强的共同利益的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或金融稳定。这些领域的努力不仅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有利，甚至对全世界都有利，所以也许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去努力。但问题是对抗、竞争、合作之间的分界线可能会移动，而且更大的可能是朝着坏的方向移动。比如你在一个领域卡我、打压我，那会影响我在另一个领域的合作意愿，起码也会在合作中保持很高的疑虑甚至敌意。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考虑设置一些什么样的条件，确保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是可行的、稳定的，如何防止以后陷入更全面的竞争甚至更严重的冷战？为了实现这一点，双方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样

的条件？

最后，我还是想说，我一如既往地喜欢弗雷德的著述，这本书也不例外，虽然我和他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支持他的这个新的想法，非常有建设性，也非常务实，对我们大家思考这些问题很有帮助。我希望它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得到实施。这就要求我们一起共同开动脑筋，思考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一些详细的要求和条件，以确保有条件的竞争合作是可行的。

**乔依德：**谢谢你，益平。现在是弗雷德的时间，你可以发表一些评论。评论员们都同意你的概念，支持你的 3C（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但可能与你书中的某些观点有分歧。你可以就此进行回应。

**伯格斯滕：**感谢所有的意见，都是非常周到和非常有帮助的意见。因为这本书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给你们们的，所以我知道你们都没有时间去阅读整本书，或者像以前那样思考它。所以特别感谢今天大家的仔细思考并向整个团队传达了思考。正如主持人刚才总结的那样，感谢大家的支持。很高兴大家

---

喜欢基本结构，同时认识到有很多问题，并在今天很坦率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时间很短，现场不能对所有的评论都做出回应，我回答两三个核心问题。

中国从全球经济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这是正确的。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不确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一些政策已经引起了反弹，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这些都是随着时间而积累起来的。特朗普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带来了一场贸易战，但它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我没有提到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一直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报复，因为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出现了政治滑坡，比如对澳大利亚的反应，对立陶宛的反应。几年前对韩国的反应，是因为与美国在安全领域所做的事情。所有这些，再加上贸易和投资政策，在其他国家引起了很多焦虑。所有这些都积累，并导致对中国的强烈反对，这有可能危及中国自身如此依赖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不是说谁对谁错。我并不是在试图缓和这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积累以及世界各地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几乎严重到足以影响中国的核心利益，即维护开放的国际体系。修改一些规则，对其进行改革，这是一件好事。但我认为中国必须认识到，中国自身的政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应之间的宏观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在中国身上反弹。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因此有这样的效果。在美国，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接受这一点，并接受与强大国家相适应的观点。无可否认，这对现代中国来说是一个新事物。但对于我的中国朋友，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它出现在与之相关的讨论中，这个新事物新想法已经在被讨论了。

当我的朋友说中国没有任何野心在 2050 年或其他时间主宰世界，或超越美国，或成为领导国家时，我有一些相反的评论。但我不想再次强调，我认为这里的重点是世界经济为了保持系统的稳定和繁荣，需要中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我们从历史中了解到，世界体系需要有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来提供这种能力。我在书中说，在许多场合中国都提供了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积极

的、确实非常出色的全球经济领导力。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就这样做了，并且确实做到了。比如，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上与美国合作。中国发挥了非常有效、非常重要的全球经济领导作用。世界需要中国。由于美国不再能够像过去那样发挥一些领导作用，该体系需要一些替代品。书中我谈到了 G0，G1，G2。如果世界还想要很好地运转，中国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回应吴心伯的观点。我认为他非常正确地谈到了改变叙事的必要性，他完全正确。美国关于中国的评价并不好。我说中国关于美国的一些评价也不太好。当他说缺乏信任时，他说得很对，不信任至少已经积累了十年，除非情况好转，否则不信任将继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两国必须联合起来，采取一些切实的步骤，一些积极的步骤，这些步骤将产生具体的、切实的、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显然对两国都有利。

关于遏制贸易战。正如我所说，可以在完全对等的基础上这样做。美国取消关税。中国取消报复

性关税。在我看来，这显然是短期内会有帮助的一步，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变两国间成见，并开始建立信任。

我要指出的是，G2 是有条件竞争合作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 3C 方法开始起作用，变得成功，改变了叙事，并开始发展一些信任，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一段时间以前，我试图在 G2 概念中捕捉到一种强烈的合作。但目前，我认为如果我们能移动到有条件的竞争合作。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这一讨论，并努力推动我们两国朝这一方向前进。

**乔依德：**谢谢弗雷德。现在观众有一些问题。美国企业如何适应功能性脱钩的情况？为什么美国企业界似乎停止在美国为中国游说？美国企业会卷入国家安全与企业利益的辩论吗？美国企业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来不断追求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伯格斯滕：**很高兴有人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它们非常重要。美国公司要如何支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刚刚提到，也许美国公司现在被安全考虑和对

中国作为安全竞争对手的担忧所左右。但还有另一个因素可，我认为，对美国公司的所有调查表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有点失望。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在远离以前的经济市场化，特别是在过去 10 年里，资源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国家控制的方向逆转，政府补贴、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问题一直在继续。而那些美国企业认为解决困难的希望正在被消除，或者至少大幅减少。这些事情似乎还在继续，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变得更糟。我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企业正在退出在国会、公众和其他地方为中国辩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改革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一个明智的战略，那就是接纳外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中国比日本聪明得多，日本拒绝投资，中国从未有这种类型的情况出现，中国在这方面更有技巧。但最近美国商界的退出，在美国的政策辩论和公共叙事中，会带走或至少减少中国传统上拥有的最大支持因素之一。这也增加了我试图表达的观点，即中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些政策。因为它

影响到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开放，这对中国本身非常重要。

**乔依德：**补充一点。最近，埃文·格林伯格（Evan G. Greenberg）在 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谈到了在中国的美国企业的一些想法，指出了美国存在的一些政治问题。我会建议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们看看埃文·格林伯格在 CSIS 演讲的文字记录。<sup>[1]</sup>

我猜永定想说些什么。

**余永定：**关于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根据世界经济将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建议，我认为可以有这样几个方面。

1. 美国降关税，争取作为中美经贸实现良性互动的一个起点，中美可以同时互降关税

---

<sup>[1]</sup>美国商界领袖、安达保险公司董事长埃文·格林伯格（Evan G. Greenberg）2022年6月14日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声称，美国必须重新承诺以基于利益的方式处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格林伯格在演讲提出了美国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三个观点：美国公司需要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中竞争；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和好处有独特的理解；美国公司必须按照他们对中国公司治理和价值观的看法行事。他指出，未来数十年全球增长故事，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亚洲的活力来定义，在亚洲中国正日益成为价值链的核心。（摘自“美国商界领袖呼吁，发展基于利益的对华经贸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安全” <https://mp.weixin.qq.com/s/rOHNL7ztwUEEQwyrT3O9Gw>）

---

2. 中美需要在全球供应链领域全方位合作，减少不确定性，而不是全方位对立。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已经成为共识，分歧在于陡峭复苏还是温和复苏。不管是哪种复苏，都会推升全球对大宗商品、能源产品的需求。下半年通胀压力还会保持在高位、甚至更大。为了减少供给的负面冲击，中美需要加强合作，减少技术上的管制、对立态度（包括新近增加对新疆棉的禁令等），减少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这是缓解滞胀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政策，可以为两国货币政策增加空间。

3.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粮食等人道主义问题上，中美之间也需要共同加强合作，增加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加强国际债务问题的协调机制，增强国际多边机构的救助、援助作用。

4. 气候变化、绿色低碳领域，加强绿色供应链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绿色治理、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生产方式（对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构成更高的门槛，发挥中国绿色产能的优势）。中国绿色产能在全球占比太高，也要注意共赢、多赢。

5. 加强税收合作协调，对美国来说也要做共同富裕，税基外流严重。对中国来说也一样。2021年10月G20平台上130多个国家达成了共识，签署了最低税率协调机制，2023年开始实行。

中国致力于参与防止全球变暖的全球努力，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去年，中国也许太着急了，我们定了很多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煤炭的减产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始做一些调整，但承诺不会改变。中国和美国可以合作以应对全球变暖，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其实也没那么难，只要双方都有诚意，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起做那些事情，来真正开始改善中美关系。

**伯格斯滕：**我完全同意永定的清单。这是一个让经济关系重回正轨的非常好的议程。但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做，那么我们两国都必须避免将这些问题与一些非常困难、有争议的政治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的诱惑，我们两国都已经这样做了。正如你所说的，认识到我们在处理的一些事上有共同利益。此外，我们要以务实和合作的方式追求它们，即使

---

我们继续有困难或其他问题，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要点，如果我们要回到你我都希望看到的那种合作，即在经济层面上达成一致。

**张蕴岭：**弗雷德你能否回答我，APEC 是否对美国还有相关性？

**伯格斯滕：**我一直在努力让它变得相关，但我必须承认，它并没有得到前几届政府的优先考虑。奥巴马政府曾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认为这是建立在你我多年前在 APEC 所做工作之上的，试图促进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然而，它是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可能注定了它的命运。现在，有了这个印太框架，正如你所说，这有大问题，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因此，我的答案是，亚太架构仍然非常开放，继续需要一些新的思维，一些新的愿景。但恐怕我不能给你太多关于美国官方对 APEC 的看法。

**伯格斯滕：**最后我要说，我们讨论的问题能在一天或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结果吗？当然不会，但我们会耐心等待。我们将向前看，一步一步共同努力。因为我有信心，特别是在我们两个机构之

间（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我们是在促进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这将是有益的，不仅是对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也是有益于所有人。